

三、回忆资料

广西剿匪斗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李天佑

1949年12月11日，红旗插上了睦南关，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广西解放后，严重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息灭。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指使下，残匪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以各种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手段，煽动武装暴乱，向人民展开了反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的大力协助下，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我军在近一年半的剿匪斗争中，消灭了土匪40多万人，彻底摧毁了广西的反动统治基础，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

广西剿匪斗争的实践，再次说明了一个真理，按照毛主席的思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广西剿匪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争指导思想的伟大胜利。

广西剿匪虽然早已胜利结束，但是，今天我们通过回忆这次斗争，来进一步体会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广西是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地区。广西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的革命斗争中，都表现了英雄的革命气概。但是广西在历史上又是个反动统治长期割据的地区，远在清末民初，军阀陆荣廷，以及后来的黄绍竑，都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自1928年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匪帮统治广西二十年间，把广西变为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采取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反动统治措施。推行所谓“三自（自治、自给、自卫）政策”，实施“军政教合一”“行新政用新人”以及“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反动政策，普遍建立民团，武装封建地主阶级，使之掌握生杀大权，成为基层中政权、财权和民权三位一体的统治者，长期训练和培养他们的忠实爪牙，借以巩固他们的血腥统治。

在我南下大军向广西胜利进军前夕，白崇禧将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匪部十多万人，有计划地沿湘桂路撤回广西老巢，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对策，企图阻挠我军解放广西，并妄想以它为根据地，长期负隅顽抗。

敌人的阴谋是异常阴险狡猾的：一方面以主力部队对我军顽抗，另一方面将部分主力分散在边沿地区的广大农村，与各地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开展所谓“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广西全省25万个甲），扩大地方武装，并且广泛地建立情报网，大量储备粮食，散发武器弹药，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与我军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为蒋匪帮将来反攻大陆的内应力量。

但是，历史的车轮决不允许倒转，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解放了广西。

广西解放初期，在我军声威震撼下和我党宽大政策感召下，部分土匪恐慌动摇，接受了和平

改编，出现了暂时的表面平静的局面。大量的敌人则隐蔽潜伏，以正规部队、地方武装、惯匪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组成了相当强大的土匪武装力量（包括白崇禧有计划留下的正规军三万人和地方武装六万人，以及为数更多的地主恶霸武装），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反动军官与特务的策划指挥下，组织武装暴乱，企图实现其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历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都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待人民事业总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①。广西的土匪同样也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时刻准备向人民反扑。他们乘我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社会改革工作未及进行，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尚不够了解的时候，实施造谣欺骗，向群众灌输反动的“大广西主义”思想，竭力制造排外情绪；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煽动群众闹事；威胁利诱，逼民为匪，他们宣称：“参加者发给粮食、银元、不参加者杀全家！”

1950年1月26日，恭城地区的土匪开始了大规模暴乱。他们在匪桂北军区司令黄绍立和官僚地主、国民党中将钟祖培指挥下，组织了三千多匪徒，攻打恭城县城。我军守城部队仅一个排30余人，英勇坚持五昼夜，连续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直到我军增援部队赶到后才解围。

恭城暴乱是全省土匪大规模暴乱的讯号。

果然，接着在平乐、玉林、龙州、宾阳、柳州等地区，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土匪暴乱的声势异常疯狂嚣张。他们到处攻打我县、区政府，袭击我分散的部队，抢劫公粮，破坏交通，杀害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桂南还成立了伪省政府，委派了伪省主席及其他人员，并且扬言“打到南宁去！”土匪的暴行更是异常残酷、骇人听闻。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烧毁村庄，残杀向我靠拢的群众及其家属，连初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他们剥人皮，抽人筋，挖人心下酒作乐；在玉林暴乱中，土匪曾将我地方干部20余人捆在大树上，浇上煤油“点天灯”，并将群众赶到现场观看，威胁说：“你们要投靠共产党，落在我们手里，就是这种下场！”群众目不忍睹，有个老太婆当时忍不住掉下泪来，土匪便将她拉出来用乱棒打死。

土匪的暴行并不能吓倒英勇的广西人民，反而激起我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无比深刻的阶级仇恨。

在土匪暴乱中，我军和民兵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忻城县，我县大队只有五个人留在城内，遭到土匪300多人围攻，仍然坚守县府五昼夜，直到民兵增援解围。柳州里四村我工作队7人，固守一屋，打垮了数百名土匪的围攻；板料村12个民兵与土匪激战一昼夜，固守待援，毙匪30余人。许多地区的民兵，都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坚决和土匪搏斗，苦战几昼夜，弹尽粮绝，仍然不肯屈服。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虽然遭到土压残酷的屠杀，但是仍然奋不顾身，送情报、当向导、送公粮，积极支援我军，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

在我军进剿中，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更是勇敢机智，前仆后继，不避艰苦，不畏牺牲，他们爬大山、穿密林，不分昼夜进行远距离的突然奔袭、拉网扫荡，结合政治攻势，逐村逐山逐洞地搜捕土匪。在奔袭土匪盘踞的灵山县盘古村时，土匪依托碉堡顽抗，我军几次爆破均未成功，部队伤亡很大。在紧急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徐汉林挺身而出，自动要求给予爆破任务。当他通过鹿砦时，不幸雷管被碰掉了，眼看爆破计划将不能实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徐汉林同志果断的以手榴弹代替雷管，用手托着手榴弹和炸药，炸毁了碉堡，为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地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徐汉林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激励了广大指战员。他们喊着响亮的口号：“向徐汉林烈士学习！”“为徐汉林烈士复仇！”踏着烈士的鲜血，冲入村内，消灭敌人一个团。广大民兵也发扬了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柳州民兵黄国义，独人单枪，依托坚固的楼房，与20余名土匪苦战一昼夜，最后壮烈牺牲。北流县民兵队长赵雄武率领10多个民兵，深入虎穴，生擒匪首3名，并打退了数十名土匪的追击。在大容山地区，40多天内就活捉土匪两千余人。

从1950年2月开始，到12月进剿结束，在这一阶段的剿匪斗争中，全省共歼灭土匪182000余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全省匪患，匪情此伏彼起，斗争形势仍然是很严重的。

广西匪情之所以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广西土匪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反动的社会基础，不连根摧毁其封建阶级基础，土匪是难以消灭的。另一方面是：在广西剿匪的实践中，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体会与贯彻，对于客观情况的认识，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这一阶段里，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广西土匪的社会基础认识不够，对广西反革命势力可能进行武装反扑估计不足，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明确确定重点剿匪的方针，不是把剿匪当作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把剿匪看成是最简单的军事行动，致使剿匪与发动群众脱节；最主要的还是过分地强调了广西的特殊性，而实际只是对广西的特殊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没有大胆收缴所谓民枪武装群众，以致大量枪支仍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宽大无边，镇压不力，有的匪首七擒七纵仍然上山为匪，威逼和杀害群众。在兵力使用上，只是战术上的集中，战役上的集中很不够，分兵把口，顾此失彼，缺乏打歼灭战的思想。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在方针、政策上更加明确坚定，作战指挥更加缜密灵活，才能完成肃清全省股匪任务。

(二)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挑起了战火，战火很快地燃烧到了鸭绿江。窃踞在台湾的蒋匪也蠢蠢欲动，阴谋乘机反攻大陆。在我国西南方面，法国侵略者继续疯狂地向越南人民进攻，战线蔓延到我国广西的边境。

广西地处祖国南方国防前哨、迅速彻底消灭广西匪患，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这关键性的时刻，象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每一个紧要关头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对广西剿匪斗争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毛主席在1950年10月，两次电报指示我们总结剿匪斗争的经验，明确指出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指示必须明确重点，端正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改进领导方法，并且明确提出要求：“明年5月1日前彻底消灭广西股匪！”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前来南宁。在他们的指导下，省委、军区于1950年11月召开了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肯定了成绩，并着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广西的政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广西剿匪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剿匪与反恶霸结合，彻底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反动统治基础。在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上，必须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对罪大恶极的匪首要进行坚决的镇压。各剿匪部队必须坚决收缴土匪及地主富农枪支，武

装基本群众，建立可靠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军事部署上，必须更好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点进剿，迅速、彻底地消灭股匪，肃清散匪，以便很快地扭转剿匪的被动局面，把广西剿匪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使大家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成为巨大的战斗力量。各级党委和广大指战员，立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行动起来，并且一致表示：“不消灭土匪决不收兵”，“坚决保证在明年五一节以前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遵照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指示，我们确定首先以瑶山、桂南（主要是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为全省重点剿匪区。这些重点地区要求做到：完全消灭股匪，全部捕获匪首；彻底收缴所有土匪及地主富农的枪支，建立巩固的地方武装，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在主力部队调走后，也能控制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和暴动；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农会、民兵，加强和巩固地区、乡政权的领导，为土地改革准备条件。同时，还明确确定，这些重点剿匪区也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点区。

在这两个地区，我军集中了全省半数以上的优势兵力，以14个半团进剿大小瑶山，以17个团进剿桂南地区。

以瑶山地区的重点剿匪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瑶山位于广西的中心偏向东北部，毗邻十多县。外围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区内山岳连绵，地势险要。梧州、平乐、桂林等地区的重要匪首和骨干匪徒三万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它不仅是桂东、桂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而且实际上也是全省土匪的总指挥部。

在进剿以前，我军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派出了四十支侦察队深入瑶山内部，调查社情、匪情以及地形道路；在部队内部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开展剿匪立功运动，介绍瑶民风俗习惯，进行战术训练和政策纪律教育；部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动员了大批干部组成随军工作队，携带了大量标语、传单、布告，深入农村进行群众工作；组织各种运输工具，秘密迅速地运送部队以及弹药、食品、被服等各种军需物资。

1月8日，我军突然封锁瑶山周围的水、陆交通。以军队为骨干，集中瑶山外围各县的地方武装，并组织了数万民兵和群众，在桂江，浔江、柳江和柳（州）平（乐）公路上，进行两线式的严密封锁，构成了千余华里不可逾越的大包围圈，截断了土匪外逃的去路。

在封江、封路的同时，我军以强大的兵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对土匪长期盘踞的地区，实行多路突然奔袭，打乱了土匪的部署，然后把土匪分割包围在几个狭小地区进一步由外向内步步压缩，实行全面控制，进行分区包干，采取驻剿与搜剿相结合的形式，展开了拉网扫荡，做到了山山有哨，村村驻兵，使土匪无隙可乘。

经过我军突然奔袭之后，土匪遭受严重打击，不得不迅速分散，化整为零，以对付我军的进剿。我剿匪部队无论在驻剿或搜剿中，都机动地采取匪变我变的战术，以分散对分散。在瑶山内外的大小村庄、山岗、路口，到处都分布着川流不息的搜剿部队。此外，根据土匪活动情况，还及时组织了飞行队、飞行组，猛打穷追，跟踪追捕匪首和散匪，真正是无山不上，无洞不入，无地不搜，迫使土匪无藏身之地。

在驻剿和进剿的同时，各部队协同随军工作队，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特别是强调了做好瑶

民的工作，开始，我们除积极进行宣传工作外，还发放了大批慰问物资，设立贸易公司，医疗站，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生活上的困难问题。

群众工作的开展，首先召开瑶民代表会议，组织农会和民兵，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剿匪、清匪斗争，因此，在剿匪地区很多民兵群众，积极参加巡逻、站岗放哨，配合我军搜捕土匪。许多地区发动了万人搜山、千人入洞，使土匪插翅难飞。其次，我们对土匪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我军部队和地方工作队，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散发了传单 50 余万张，做到了“标语上山、传单入洞”，“人人开口、家喻户晓”。我们还采取了以匪治匪的办法，通过土匪的家属开展规劝运动，争取土匪投降自新。我们通过具体事例广泛宣传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宽大或释放了自新匪徒，同时也严厉地镇压了顽抗的首恶反革命分子，迫使土匪内部迅速分化。有的土匪半夜找工作队自新，说：“今晚不自新，等不到明天就要给活捉了”。有的土匪说：“老百姓都跟共产党走了，这回真没有办法了！”

在瑶山前后 50 天的会剿中，我军共歼灭土匪 38000 余名，主要匪首林秀山、韩蒙轩、甘竞生、杨创奇等和重要骨干分子无一漏网，拔掉了广西东北部反革命的“钉子”，粉碎了敌人以瑶山作为与我长期顽抗的指挥中心，打乱了全省土匪的统一部署。

瑶山剿匪的胜利，使瑶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摆脱了李、白、黄匪帮的长期压迫和剥削，生命、财产有了可靠的保障，生活安定下来了。他们一致反映：“盘古开天地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政府和军队。”瑶族欢唱山歌，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解放军。

在瑶山进剿的同时，我军对桂南地区的土匪也开始了重点进剿。

桂南地区和瑶山特点不同。它包括现在广东省的钦（州）廉（县）地区，接近南海，西南毗邻越南，横跨两省十多个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其中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的地形，虽远不如瑶山地形险要，但也是广西土匪长期盘踞的重点地区。这个地区的数万土匪，在 1950 年秋季我军进剿时，未遭受严重打击，还有相当雄厚的兵力，经常与逃往越南边境的残匪勾结危害我国南海边防的安全。蒋匪帮并企图把这一地区作为反攻大陆的落脚点。因此，歼灭这一地区的土匪，对巩固我国南海边防的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正当我军向桂南十万大山地区进行会剿途中，突然收到重要情报——土匪要向越南逃跑！

我军根据这个新的情况，及时命令各部队抓住战机，轻装疾进，坚决不让土匪逃往越南！

战士们连续进行了三昼夜的奔袭，日夜行程万余里，不怕艰苦与疲劳，忍饥挨饿，爬山涉水，人不歇肩，马不停蹄，不顾山高路远，进行巧妙的迂回，从东南西北四面下网，形成了铁壁合围。

土匪刚到达边境附近，眼看就要越过国界，不料恰巧被我军一个团迎头截住，被歼灭了一部分。土匪夺路东逃，却遭到我另一个团的阻击，匪总指挥韦秀英被击毙。土匪逃至太平山一带，又被我第三个团紧紧追上。土匪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的东奔西逃，处处挨打，终于逃不脱就歼的命运。

在桂南各地实施奔袭合围以后，部队随即分散清剿，配合地方工作队，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收缴土匪及地主富农枪支，普遍进行减租退押、反霸等活动。

在桂南重点进剿中，我军歼匪 64000 余人，收缴枪支 96000 余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瑶山、桂南重点剿匪的两个半月内，全省共歼匪 180000 余名，收缴枪 220000 余支。除桂

西北和桂西 30 多个县外，在全省 71 个县内消灭了股匪。广西剿匪形势起了急剧变化，许多地区的土匪，纷纷投降自新。

瑶山和桂南地区剿匪的胜利，是全省剿匪斗争中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斗争的局面。

瑶山、桂南地区剿匪胜利结束后，我军集中了 16 个团的兵力，回戈指向桂西北和桂西。

桂西北和桂西，与湖南、贵州、云南三省交界，是广西较偏僻的地区。区内山岳连绵，原始森林很多，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路狭岩险，石洞很多，历来为土匪便于潜伏活动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土匪大部分是当地的地主、恶霸武装。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长期与我为敌，并有较多的与我斗争的经验。当我军从这个地区抽调部分兵力进剿瑶山、桂南的土匪时，他们乘机猖狂活动，占领了一些县城和村镇，威胁群众，布置空室清野，开办土匪骨干训练班，发展武装力量，在要道隘口修筑碉堡，埋设地雷，准备长期与我周旋到底。

我军在桂西北和桂西的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对土匪盘踞的重点地区，实施长途奔袭，接着紧缩包围，进行拉网扫荡。

土匪极端狡猾，他们已早有准备，由于地形熟悉，行动十分诡密。当我军进剿开始，他们即化大股为小股，分散流窜，特别善于回旋于三省交界地区，情况紧张即北窜贵州，西窜云南。

针对这种情况，我军除了有效地吸取瑶山、桂南重点进剿的经验外，还特别注意了配合外省兄弟部队的会剿。在会剿部队中，共同制订了边境统一作战方案，明确区分相互间的任务，规定必要的联系制度，及时交换情报，强调主动配合。

经过一个多月桂西北、桂西的剿匪斗争，于 5 月初胜利结束，歼匪 5 万余人。至此，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省的股匪已被消灭，共歼匪 40 多万人，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广西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摧毁了反动统治除级的社会基础，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使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1951 年 5 月 16 日，毛主席亲自来电嘉勉广西剿匪的胜利。

(三)

广西剿匪斗争，从 1950 年 2 月到 1951 年 5 月，历时十个月，以毛主席的指示为转折，截然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的实践，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伟大。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②的确，自有阶级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所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广西是李、白、黄匪帮长期盘踞的老巢，反动统治基础相当深厚。广西的反动阶级，象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历来都在极力地巩固他们政治上、经济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特殊地位。当他们的政权被推翻后，他们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始终不甘心灭亡，为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必然和用一切条件，进行垂死的挣扎。即使遭受严重的打击，也会暂时潜伏，养好创伤，然后寻找机会向人民反扑，企图将革命扼死。广西在解放初期，群众尚未发动，原有反动阶级仍然盘踞着广大农村阵地。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斗争形势，

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一场严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摧毁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

在这场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能否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和能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关键问题。广西剿匪的最后一阶段，我们检查了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掌握了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分析了广西的社会情况，抓住了斗争的中心环节，坚决地向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冲击，从而迅速地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彻底地扭转了被动局面。

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③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于解放初期广西的剿匪斗争有着极其巨大的指导意义。

广西的土匪，是一支庞大的、经过训练的反动阶级的武装。他们控制着广大农村的政权与我对抗。在当时情况下，我军以武装斗争摧毁反动阶级的统治，以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主要斗争形式，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否则就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必须继续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彻底、干净地肃清土匪，摧毁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柱，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党我军巨大而迫切的斗争任务。在剿匪的前一阶段，由于对匪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剿匪斗争作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去解决，整个斗争形势就显得很被动。在最后一阶段，大家认识到剿匪斗争实际上是革命战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当时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加强了党的领导，组织了全省党、政、军、民的力量，全力以赴，抓住了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环节，斗争就得以顺利发展。

剿匪斗争是一场复杂、残酷的阶级斗争。斗争实践的经验证明，必须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中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使大家亲身体会到只有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势力，掀掉自己头上的封建压迫，获得阶级的真正解放。

当时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这一阶级斗争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解决下列三个问题：一是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问题。对胁从分子和改过自新的土匪必须宽大，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对于匪首和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以及屡教不改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通过群众公审，加以坚决镇压，只有正确掌握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才能瓦解土匪，争取与发动广大群众。二是剿匪与反霸相结合。广西的土匪为什么如此猖狂？因为它不仅得到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支持，而且和农村的恶霸地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剿匪必须与反霸结合，必须在军事行动的同时，领导群众同压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地主展开声势浩大的反霸斗争，打击地主的威风，使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力量，提高斗争信心。三是收缴枪支与武装群众相结合。土匪、恶霸地主所以敢于与我对抗，是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枪支。因此，开展剿匪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坚决收缴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枪支（富农的在内），武装基本群众（贫、雇农），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民兵和各级地方武装）。这种枪换肩的形式，不仅收缴了敌人的武器，而且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于深入发动群众与开展人民战争意义十分重大。这样，经过镇压、反霸、收枪三结合的措施，群众的顾虑解除了，觉悟提高了，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运动。

在军事指导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主席历来反复强调的一条最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他一贯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④由于我军接受了前一段剿匪的经验教训，针对广西剿匪

作战的情况，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更好的贯彻这个指示精神，首先在战役范围内集中了优势兵力，重点进剿瑶山、桂南土匪，尔后再进剿桂西北和桂西。特别是对瑶山的土匪，采取了千里封江，封路，层层包围，长途奔袭，分进合击，驻剿和搜剿等不同形式，在军事指导下很快就转入主动，并且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因此，在每次大小战斗中，都给了土匪以致命的打击，不仅打击了土匪的气焰，促使土匪内部分化，而且大量歼灭了土匪的有生力量，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剿匪斗争的形势。同时，在整个剿匪过程中，在战术上，各部队根据地形条件和土匪的活动情况，机动灵活地采取匪变我变的战术，及时将奔袭、驻剿、搜剿三者紧密结合。这就不仅发挥了人民解放军大部队作战的特长，而且还创造了适合小分队作战的各种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了小分队在分散剿匪作战中的战斗作用。

由于在政治上坚定地贯彻了阶级斗争路线和剿匪的各项具体政策，在军事上集中了优势兵力，贯彻了重点剿匪、彻底围歼敌人的方针，因此在后一阶段，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地歼灭了广西全省的股匪。

实践证明，广西剿匪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温故而知新，我们必须经常结合实际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深刻体会毛主席的阶级观点，战略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

注：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9月人民出版社一版，第1490页。

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

③《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3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505页。

④《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7页。

广西解放后初期剿匪问题

莫文骅

一、衡宝战役后率大军入桂

1949年9、10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起衡（阳）宝（庆）战役，拉开了解放中南的战幕。10月间，我奉命赴湖南常德就任四野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与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一道率部挺进湘西。衡宝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奉命进军广西，追歼国民党桂军残敌。部队至宝庆时，程子华同志他调，由我率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九军三个军继续向广西进发，参加解放广西战役。同时入桂的还有四十一军，他们占领桂林后，进军梧州、玉林等地。我三十九军先后占领柳州、南宁、钦州、龙州，三十八军则由柳州向河池、南丹、百色一带推进。我率兵团部由桂林至柳州，12月中旬抵南宁。12月11日，我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宣告了广西全境解放。接着，十五兵团和二野四兵团，四十一军等，围攻全歼中南敌军20万于雷州半岛。

广西解放后，中共广西省委、广西省人民政府、广西军区正式成立。张云逸、陈漫远、何伟、李楚离等同志入桂前，由我奉命组织和主持省委工作。12月下旬，张云逸到南宁，出任省委书记，莫文骅、陈漫远、何伟、李楚离等任副书记，协助张云逸工作。广西军区亦于12月成立，张云逸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永胜为第一副司令员（不久他调），李天佑为第二副司令员，彭明治

为第三副司令员，莫文骅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吴法宪为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省军区领导机关由十三兵团直属机关兼任（不久，兵团撤销）。

这期间，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接管城市，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军事管制，稳定局势。我军调出干部千余名与原游击部队一部分干部，充实各专（署）、市、县、区民主政权组织机构，并延用一批地方正直的民主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权。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大城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持治安。短时间，交通和邮电初步恢复，工厂也复工。社会秩序亦有好转。(2)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整编地方游击队，建立县、区武装。与省军区建立的同时，在桂林、柳州、平乐、宜山、宾阳、梧州、龙州、武鸣、玉林、百色等10个地区，建立了军分区，并以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原则上由各军分区整编该区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并经过解放前斗争考验的游击部队，成立县大队、区中队等地方基本武装。(3)宣布我党城市政策，没收敌伪物资，收容散兵游勇，禁烟禁赌，保障城市工商业照常生产，着手发展地方经济。(4)继续追歼残敌。军事追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由于正确运用和平改编或争取投降的方式，至1950年1月底，全省收降改编敌残余正规武装计20股，14000余人。坚决消灭敢于顽抗之敌，取得了平而关围歼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以下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二、剿匪反霸工作：

收降、改编敌残余正规武装，消灭敌主力后，剿匪反霸工作全面展开，确立了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思想。我们剿匪的有利条件是：(1)政治上：我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推翻了长期以来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从此翻身作主，他们欢欣鼓舞，衷心地拥护我党我军。(2)军事上：我军从东北战斗到广西，捷报频传，一路胜利。广大指战员斗志很高，情绪激昂，充满了胜利信心。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7月，经过追歼残敌，镇压土匪暴乱、进剿股匪等主要步骤，剿匪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条件，影响了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1)我们主观上对广西匪情认识不够深刻，对匪乱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敌垮时，布置特务进行隐蔽斗争，又暗中组织武装反动基地，并和当地地主恶霸勾结，甚至裹挟群众参加。因而广西土匪有一定社会基础，是一股武装的政治土匪。但初入广西时，我们的认识和估计还不十分清楚。(2)缺乏本地干部，语言不通，工作难于深入开展。(3)部队中有不安心在广西工作的思想和不愿打小仗、要打大仗的思想存在。(4)解放初期，广西农村封建势力尚未摧毁，地主恶霸仍然控制着一些群众。(5)兵力不足。当时广西有70多个县，我们兵团三个军共13万多人，加上四十五军约5万人及四十一军一个师约5000人，共有兵力18万余人。但不久，三十八军部率两个师约3万人调走。部队所到之处，只能占领城市，乡镇、山区不能完全控制。为了支援越南的解放（奠边府战役前），我们以五百辆卡车来回从宜宾到龙州运输军用物资以支援越南，要抽出一个师的兵力护送，以防土匪袭击。这样，兵力用于整个剿匪的就较为单薄，部队摆不过来，有些地方无兵可派。为此事，我陪张云逸同志几次到汉口中南局开会时，都曾向上级提出过意见，要求增加兵力。但直到1950年12月中旬，二十一兵团才入桂参加剿匪。

当然，主观上，剿匪工作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表现为：(1)重点剿匪突出不够。剿匪初期，

我们不是没有重点，各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剿匪重点，但没有确定全省的剿匪重点区。“整风”过后，确立了以1950年冬季实行土改的17个县和主要交通干线及其两侧与产粮丰富、人口众多地区为剿匪重点区，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由于兵力有限，无法集中全省兵力去歼灭一个主要地区的股匪，重点剿匪区只能是相对而言。(2)发动群众不够。我们的工作欠细致深入，筹粮触犯了一些老百姓的利益，军民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剿匪主要是军事行动，政治上未能形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然而，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是：(1)关于“宽大无边”：广西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中南局遵照毛主席“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指示，曾要求我们根据广西太复杂的情况，在剿匪工作中“政策要稳妥”。据此，我们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确有血债的土匪头子（如钟祖培等）。那时，捉了不少的匪，但关不了那么多，更不能都杀，因此，有些经教育后予以释放，其中有少数又复为匪。相对以后镇压的土匪、恶霸数目而言，开始杀匪是少一些，但不能说对土匪“宽大无边”，更谈不上有意放纵，“七擒七纵”。土匪增多，也不能说是“越剿越多”。有些开始隐蔽，后来又起而暴乱，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我们并没有“民匪不分”，不过由于广西土匪有一定社会基础，因而匪、民有时的确难分。尽管如此，我们力求严厉镇压、打击土匪，保护群众，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2)关于民枪收缴问题：所谓民枪，实际是在地主、恶霸、军阀控制下的，他们搞保甲制度。广西差不多家家有枪，我们当时的决定是，总的任务是要收，但部队到达就出布告收枪，部队不到的地方暂不收枪；建立了政府的地区收枪，否则亦暂时不收。因为广西老百姓爱枪如命，他们的枪支，或用于防身自卫或用于械斗，有的也用来抢劫及保护走私，各种情况都有。军队未到，一律要收缴，势必引起不满，也收不到。有枪并不一定是匪。因为这些原因，初期剿匪时，民枪未能全收。

初期剿匪存在一些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事隔四十一年，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核对是必要的。整风以后，确立了冬季重点进剿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从1950年10月到12月上旬两个月的重点剿匪，共歼匪8万余名。这一胜利，打垮了土匪的疯狂气焰，争取了军事上的全部主动，全省剿匪形势亦由此转为主动。

三、毛泽东来电后的剿匪工作：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毛主席十分关心广西的剿匪斗争，为了对付美蒋联合、有可能在华南登陆的情况，他希望广西尽快消灭土匪，抽出兵力应付时局的变化。我们也非常着急，既要剿匪，又要准备抗击美帝可能登陆。10月，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到广西检查工作，发现剿匪进展不快，便直接打电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更加着急。11月14日，毛主席电示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说：“为对付台湾蒋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并令叶剑英即赴广西帮助工作，限剿匪六个月完成。接着毛主席又打电报给我们，批评我们剿匪落后，我们接到电报后，非常重视，感到形势紧迫，当即由我执笔以广西省委名义回电毛主席，检查了剿匪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汇报了下一步重点剿匪的计划，并欢迎叶剑英、陶铸来广西指导工作，我们再次提出兵力不足，要求加强。11月底至12月初，我们召开了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叶剑英、陶铸主持会议，张云逸和省委、军

区同志都发言，并检讨。大会进一步检查过去剿匪工作上的不足，确定了全省的重点剿匪区及剿匪发动群众的部署。这时，二十一兵团也入桂参加剿匪，兵力大为加强，我们有条件组织全省重点剿匪。于是，从1900年12月起至1951年2月，我军对盘踞于瑶山、桂南地区的大股土匪发起猛烈的进攻，歼匪1万8千余名，取得了军事进剿的重大胜利。同时，在全省范围开展抓霸、镇反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抓霸1500余名，处决了800余名；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全省共杀匪首及坚决反革命分子34000余名，给予广西土匪与地主阶级以惨重的打击。

随后，我军又集中兵力进剿桂西北地区的股匪。到1951年5月1日前，全省股匪基本肃清，如期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同年4月，我对广西剿匪斗争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不久即调离广西。

1990年6月22日于北京

(张奇整理)

在原宜山地区剿匪的回忆

贺亦然

1950年7月下旬，陆军五十八军一七四师奉命开赴宜山地区，接替一一五师的剿匪任务。当时，我担任一七四师政治委员。

一七四师的兵力，辖五二〇团、五二一团、五二二团和特科大队(相当团)；河南军区十五团调归我师建制；铁道兵三十三团划归我师指挥。三十三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剿匪，而是负责拆迁都匀到金城江黔桂线的铁路，赶修来宾到镇南关这段铁路。

部队到达之后，我们不了解情况，只能先按一一五师的部署，接替他们的防务。五二〇团接替河池、南丹、思恩和铁路守卫任务；五二一团接替罗城、天河剿匪任务；五二二团部署在宜山和接替护路任务；十五团和军分区独立营在忻城守护公路(宜山至忻城、大塘至迁江)和进剿公路两侧之土匪，确保公路通行无阻。部署接防完毕，师和团都没有多少机动兵力了。

当时宜山地区总的情况：土匪控制区有730多个村庄，约占50%强，该匪控制了5个县的大部份地区，3个县的小部分；而我才能控制416个村庄，占31%强；其它约占33%强的地方是敌我争夺之地区。据当时广西省军区的通报：宜山地区有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军政司令部陈与参1000余人，下辖一总队司令韦作屏，副司令黄旭廷，共有1400余人。反共救国军黔桂边第二纵队司令韩勋，这一股约800余人；第三纵队司令罗松桥，副司令温强，约有4500余人；第五纵队司令黄威宜，副司令覃石林，约有1300多人；第七纵队司令梁庆春，副司令夏廷玉，约1300多人；第八纵队司令朱志达，约1100多人；第九纵队司令林图轩，约900多人。还有十一纵队、四纵队、一纵队人数各有一二百人。匪纵队下辖的番号共有39个支队，小股土匪难以统计了。土匪合计约有1.6万多人。

广西是李、白、黄长期经营的老巢，有一套反动统治的办法，如什么“三寓政策”(寓兵于民、寓将于校、寓征于募)，并鼓励人民当兵，如普遍叫群众唱一首歌，其中有几句“广西是个好地方，男儿都刚强，天生会打仗……”。所以民性强悍，当过兵的人多，民枪多。在蒋家王朝覆没之际，李、白有预谋的留下了一批军、警、宪、特，仅正规部队留下的残部约有三几万人。当时又正值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一直打到鸭绿江附近，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朝鲜政府紧急求援，我志愿军受

朝鲜政府的邀请，出兵抗美援朝。于是国民党、土匪到处叫嚣：“李、白反攻大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军就要打进东北了！”这时我们又拆金城江到都匀的铁轨，抢修来宾到镇南关的铁路。土匪造谣：“大军（指解放军）不会久长，把拆出的铁轨，都运到北方去了！”群众惶恐不安，土匪更加猖狂！

我师刚刚接防完毕，师部的几部电话机和配有电台的团，都是告急电话、求援电报。因为分散驻守的各个点，大都遭匪围困和袭扰。师部驻在宜山县城的龙江河岸边，土匪在河对面多次向我扫射，甚至混进师司令部打了数枪而潜逃，形势异常紧张。我们接防完毕，师、团都没有多少机动兵力，也深知这样部署基本上是分兵把口了。可是没有摸清情况也难以马上改变原来的部署。不能集中兵力，没有拳头，怎么能消灭股匪呢？怎么能变被动为主呢？这是我们最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命令各守点部队加紧构筑或加固防卫工事；同时也命令团营领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改变接防的原部署，凡是暂时收缩的据点可以主动收缩一下，便于集中较多的兵力，以便进剿股匪；师、团机关人员，武装起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必要时可随部队进剿土匪。

不久，广西军区转中南军区令：一七四师与宜山军分区合并，省委通知该师政委贺亦然任宜山地委第一书记。这是重要的措施，党政军民可通过地委都统一起来，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为剿匪的胜利而行动起来，实现全党、全军、全民总动员。

1950年8月上旬，省委、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高干会议）进行整风，这时，毛主席批评了广西剿匪不力：我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汉昭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实行重点剿匪，纠正了分兵把口的错误；二是正确执行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纠正了对匪首、恶霸宽大无边的错误；三是不论匪枪，民枪只要交战一律收缴，纠正了打完了仗还得区分匪枪、民枪，不得收缴所谓民枪的错误。这是英明的决策，对迅速改变剿匪的被动局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次高干会议之后，马上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在党、政、军、民中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针政策，根据重点剿匪的精神，调整了分兵把口的部署。决定以宜山为中心，分南北两片为重点，每个团尽可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重点打击股匪。北片重点以五二一团为主，先消灭以罗城县四把乡为中心的16个乡范围的股匪；南片重点以五二二团为主，先消灭宜山县南部地区的股匪。以上为两个重点剿匪区。十五团及宜山军分区独立营，除维护公路交通外，进剿大塘到忻城两侧的土匪。五二〇团除担负守护铁路任务外，进剿河池、思恩、南丹的股匪。各县的县区武装与主力部队统一行动。地方上还组织了约2000多人的工作队，随军进剿。先后还组织了18个民兵连配合进剿。县区武装、民兵和地方干部一起进剿，解决了一七四师是北方部队，对广西语言不通、民情不熟、匪情不清和在茂密的丛林山地作战缺少经验的困难，对剿匪起了重要作用。

南北两片重点区的股匪，按其番号有2个纵队、12个支队、32个大队，合计大小有59股。

对股匪作战强调打得狠，力争多打歼灭战。进剿后连续打了14次歼灭战。震动比较大，影响大的有围村、北山、安马、四堡、胡长、屏南、龙岗、山德音和地黄等几个地方的战斗，振奋人心，惊破匪胆！除匪二支队陆福才和十一纵队，司令李益卿逃窜出重点地区外，其他股匪大部全歼，或基本歼灭，这段期间共消灭土匪8100多人，缴获长短枪4931支，轻重机枪13挺，子弹2

万多发。伪专员韦家恩被击毙，纵队司令朱志达，副司令李秀楠被我活捉。

在这段期间，非重点区的五二〇团、十五团和独立营也都打了不少歼灭战或重创股匪，全区除天峨、南丹外，局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当股匪受到惨重打击时，还有未被消灭的则采取小股活动，缩小目标，保存力量。依据这一情况，我相应地调整了部署，斗争手段上也作了改变。以我之多股分遣小部队，采取梳子队形反复合围敌之小股。五二二团以20多支小分队反复合击洛富乡一带，迫使匪小股也不能活动了，不得不插枪为民，以待时机。

根据匪情这一变化，我则采取分遣部队驻在匪众多的地方进行驻剿。主要是开展政治攻势，号召投降自首，宣布凡投降自首的宽大处理。同时结合摸清不来投降的土匪行踪进行捕捉。宜山县的屏南乡几天内有900名土匪投降，祥贝乡、小龙乡有1000多名土匪投降。

大部土匪投降自首了，但是投降的土匪有的并不死心，采取投降不缴枪或者纯粹是假投降，有的隐瞒其官衔职务，装作匪众投降，个别的还偷偷活动。还有少数出身不好或当土匪后自觉罪大不敢来投降，逃进深山密林以待时机。对此，我部采取凡投降自首和被捕捉来的匪众，集中起来办训练班，军分区和各团都举办集训班。通过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开展诉苦运动，提高其阶级觉悟，而后宣布约法十章，并号召立功赎罪，检举揭发。南片开办了20多期集训班，训练了近3000多人。经过教育训练，坦白和被检举有官衔的土匪200多名，其中检举出改名换姓的匪团长李宏允1名；坦白交出隐藏的重机枪1挺、炮1门和步枪167支。重点剿匪3个月的不完全统计；投降自首的土匪达5780多名。

对付逃亡上山之散匪，我部则采取军民一起大搜山。当时群众说：“下人网（发动群众搜山），捕大鱼（指捕捉最顽固的土匪）”。各团都组织过多次大搜山，宜山太平乡、洛崖乡发动群众4000多人，与我军一起，将两个乡之山普遍搜捕一次或几次。军分区驻在宜山县县城，有的土匪把县城附近当成“灯下黑”。我们组织城关群众和机关干部约2500多人，对宜山城附近的山展开搜查，影响很大，逼使土匪纷纷投降。

贯彻执行省委、军区指示精神，实际上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影响最大的股匪；第二阶段，股匪被歼灭或击溃了，改变战术以小股对付我之围剿。我则以分遣多股小部队对付匪之小股；第三阶段，小股也不能存在了，便采取分散隐蔽以待时机，我则在匪情严重的地方，部队驻下来，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号召投降登记并结合捕捉，第四阶段，土匪隐藏不住了，不得不投降，我则采取变其假投降为真投降，主要方式是将降匪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上述四个阶段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匪变我变，所采取的灵活战术手段而已。

上面主要回顾军事进剿问题。剿匪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执行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特别是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待民枪的政策，以及民族政策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从整体说，实际上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斗争。

关于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我们采取了对罪大恶极又顽抗的匪首，俘虏后召开群众公审控诉大会，执行枪决。如匪纵队副司令、大恶霸李秀楠，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之后，震动很大，群众到处反映：“枪毙了李秀楠，给我们除一了害、出了气！”，祥贝乡枪决了匪首伪乡长以后，一名伪村长带着23名土匪来投降。在公审枪决了匪旅长戚廷芳的同时，对带领我军活捉戚廷芳的

那个土匪当场宽大处理，并给了他物质奖励。据统计，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匪首、恶霸 194 名，处决罪大恶极的 137 名。这样体现了顽抗的坚决镇压，投降的从宽，立功的受奖，纠正了宽大无边的错误。

关于民枪问题。以前军事进剿把股匪打散了，而他们躲藏在民间，穿着便衣的，与群众难以区分；而枪支又说是民枪，民枪不能随便收缴，这就造成很难真正消灭土匪。当时有个错误的判断：广西不同于其它地方，民枪多，群众爱枪如命，如果你收缴了民枪，本来他没有当土匪，为了保护他这支枪，也就去当土匪了，这样土匪会愈剿愈多。所以曾规定只缴匪枪不缴民枪。殊不知匪枪、民枪在匪乱期间是很难区分的。实际情况是我剿匪胜利了，土匪散在民间，匪枪也说成民枪，你无法区分；如果战斗失利，起码有的为了“发洋财”，是匪不是匪的枪都扛出来参战了。我们一次从马尾乘坐火车回来，路经南丹县以东，被数千土匪包围了。土匪没有料到乘坐的是铁甲列车，我们打了几炮，土匪立即散去。原来他们以为我们乘坐的是客、货车，想发洋财，所以一听炮响就知道无利可图，便散去了。我们正确执行了收缴民枪政策，采取你说是民枪，我们给你打个收条，暂时登记收缴保管。这项政策对肃清匪患，也是重要的。

宜山地区是个民族地区，五二〇团剿匪，有的土匪跑到瑶族地区，该团在瑶族聚居区剿匪时，带去盐巴、针线等日用品，解决群众因匪乱日用必需品奇缺的困难，群众很高兴。那时瑶族备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如瑶胞出来卖山货，竟有人拿上坟烧的“鬼票”当真票子去骗货。部队就帮他们认票子，辨假票，免受欺骗。同时组织有影响的头人到金城江参观。瑶族兄弟们看到汽车、火车、电灯、电话高兴极了。经过我军从多方面做瑶族的工作，有的瑶胞主动给我军送情报，主动带路捕捉、围剿土匪，使土匪在瑶族地区无法存身，这些地方的匪乱很快得以平息。

重点剿匪 3 个月的统计：消灭股匪 53 股，歼匪 8000 多名，投降自首近万名；缴获机、步枪 5000 余支（粉枪不计在内）；击毙团以上匪首 11 名，生俘营以上匪首 40 余名。同时粉碎了旧保甲，建立了乡政权。有的乡村成立了农会，整顿发展了民兵，县大队、区中队比较顺利的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地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剿匪胜利的实践，证明省委、军区第二次高干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开始集中兵力重点剿匪时，也遇到一些困难，如我主动撤离的防守点，干部群众十分惊恐，说：“部队撤走了我们怎么办？土匪见大军集中，岂不扰乱更猖獗？”等等。实际上我集中兵力，打击股匪越猛、越狠，土匪也就愈恐慌。在我撤离的地方，并没有发生土匪更加猖獗的情况。刘伯承元帅有句名言：“保地损兵，人地两失；撤地保兵，人地两得。”广西剿匪也证明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950 年 11 月间，广西省委、军区召开第三次高干会。这次总结检讨了前一段剿匪的经验教训。总的认为前段剿匪虽有进展，但是重点还不重，还不够突出。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决定全省以大瑶山为重点，组织强大兵力进剿。宜山地委书记贺亦然、张伟烈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调一七四师五二〇团参加大瑶山重点剿匪。

在大瑶山剿匪战斗中，五二〇团与兄弟部队打得很好，大匪首、桂中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被我五二〇团侦察参谋彭玉林等活捉。歼敌成绩均是与兄弟部队联合作战所取得的，此文不赘述。

1951 年 3 月，军区部署开始对桂西北重点剿匪。共分三个重点区：柳北重点区；南丹、天峨重点区和桂西重点压。我一七四师五二一团和师炮兵营参加柳北重点区剿匪；五二〇团和五二二

团参加南丹、天峨重点区剿匪。

五二一团、师炮兵营和柳州军分区四三六团，首先合击罗城县之三坊大苗山县之香粉一带。经合围进剿，反复奔袭，辗转扫荡、驻剿、搜捕，结合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股匪被歼，梁庆寿、林茂权等多股匪首或被击毙或被俘，无一漏网。

我师师长郭庆祥，参谋长刘始明率五二〇团、五二二团和廿一兵团的六四〇团、六四一团于1951年4月6日，开始向南丹、天峨地区进剿。到5月底，除黄景芬匪首带千余人窜入贵州境内（也被贵州某部消灭），原来这里的股匪8个纵队番号，大小58股，5800余人，全部被歼。主要匪首三纵队司令罗松桥，四纵队司令莫礼衡被击毙；一纵队司令罗民中，五纵队司令李瑞华，十纵队（又称二纵队）司令韩勋，二十一纵队司令莫云，桂黔滇纵队司令罗绍卿先后向我投降。这一地区的土匪基本被消灭。这次重点剿匪，我五二〇团从4月19日到5月5日，在河池县角田、保平地区，歼匪1312名，缴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44支。

据现有档案统计，一七四师（含宜山军分区地方部队）在宜山地区整个剿匪斗争和清匪反霸斗争中，合计共歼匪38768名，缴获长短枪25292支。参加广西剿匪共有10个师，根据军区战报统计，一七四师的战果是较大的。

在剿匪的声威下，向地方政府、农会缴出土匪隐藏的机关炮2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30挺，步马枪5536支，短枪3328支，土枪0000多支，各种子弹2万多发。

至于协助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组建农会，整顿和发展民兵等等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体在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

剿灭大瑶山地区股匪的回忆

廖联原

广西军区重点进剿大瑶山地区股匪作战，是在浔江南岸第一阶段重点剿匪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从1951年1月8日开始，3月5日胜利结束，历时69天，全歼了麇集在大瑶山地区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股匪。从此，彻底粉碎了白崇禧集团，妄图以大瑶山为“游击根据地”作垂死挣扎，“等待美援”反攻大陆的美梦。

进剿大瑶山地区股匪作战，是由当时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总指挥，柳州、平乐和梧州三个军分区指挥所协同作战完成任务。梧州军分区指挥所是由程启文、曹传赞和我负责。对这一成功的战斗，过去因为忙于实际工作，来不及系统总结。现在曹政委已经去世，程司令员调离了广西工作。中共广西武装斗争史编写办公室和广西军区党史办公室要我写这一总结性的回忆录，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写得不够理想，甚至有差错是难免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匪情梗概

（一）大瑶山土匪暴乱的总根子。

1949年10月上旬，国民党集团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在湖南衡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击破后，白于10月16日狼狈逃回桂林，……布置实施所谓“总体”战。将广西省划分为6个军政区。即：桂东军政区，甘丽初为司令兼新编第十军军长，甘竞生为副司令，司令部设在八步；桂南军政区，罗活为司令兼新编第十一军军长，卢士林为副司令，司令部设在玉林；桂西军政区，莫树

杰为司令兼新编第十五军军长，黄轮庭为副司令，司令部设在南丹；桂北军政区，周祖晃为司令兼新编第十三军军长，霍冠南为副司令，司令部设在桂林；桂中军政区，王景宋为司令兼新编第十四军军长，秦镇为副司令，司令部设在柳州。王景宋到职后，“选定瑶山为游击根据地”，林秀山为第二游击司令；桂黔边军政区，张光玮为司令兼新编第六军军长，胡成栋为副司令，司令部设在百色。

综上所述，白崇禧集团这些垂死挣扎措施，在我军解放全广西时，他们和其野战军一样都被粉碎了。他们当中不少人放下屠刀，向人民靠拢，获得了新生。但有些人顽固不化，继续与人民为敌，就成为解放初期广西省各地特别是大瑶山地区土匪暴乱的总根子。

（二）大瑶山地区股匪的组织者。

大瑶山地区股匪的组织者，主要是白崇禧集团桂东、桂南和桂中 3 个军政区有关专区的专员。冯璜是广西容县黎村乡天堂山人，早年就是白崇禧集团的骨干。抗战时期曾任新桂系十六集团军三十一军副军长。解放战争末期，1949 年 6 月，白崇禧集团委任冯璜为梧州专区（又称第三专区，管辖苍梧、岑溪、容县、桂平、平南和藤县共 6 个县）专员时，白崇禧亲自对冯璜说：“戡乱救国还有希望，美国政府肯替我们撑腰……梧州是本军的发祥地，位置重要，你必须把治安搞好，勿负重托。”（冯璜《解放前夕我在广西第三专区的活动纪实》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冯璜走马上任不久，一连升官兼任“反共救国军”的师长、军长职务，白崇禧还授权给他直接指挥新桂系野战军驻梧州的一二九师（师长杨创奇）。弄清楚冯璜是白崇禧集团的亲信，才好理解他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还那样积极反共反人民，为白崇禧集团卖命的苦衷。

冯璜是大瑶山地区股匪组织和指挥者之一，事实很多，举其主要的如次：一、冯璜到梧州专区上任后，据他自己说：“我意在第三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对共产党顽抗到底。第三区有大瑶山、大容山和天堂山比较险要，特别是大容、天堂两山比较接近我的家，人地都比较熟悉，可作狡兔三窟的经营。”“同时规定第三区各县县长亦要选择一个以上的游击根据地。”（出处同上）二、梧州将解放时，冯璜还委梧州市警察局长卢英龙兼任“反共救国军”师长。与此同时他把梧州市水上警察分局撤退到大容山和天堂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当这些反革命武装警察在平南县武林口上岸后，被我桂中游击队平南县大队歼灭，缴获步枪 45 支、轻机枪 2 挺、重机枪 1 挺；冯璜还将大批武器弹药分发给第三专区 6 个县保安司令，企图加强那里的“反共救国军”。据当时我桂中游击队桂平县大队的报告，桂平县敌人撤退到西区被我截获的步枪 130 支、重机枪 1 挺、追击炮 1 门，缴获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刘栋材运回桂平县家乡的步枪 280 支、炮 2 门、子弹一大批。三、冯璜撤出梧州时，把卢英龙（市警察局长）、林中奇和欧阳拔英（地方恶霸）送到藤县大黎组织土匪；冯璜撤退到藤县、平南、桂平时，都分别找那里的县长邓光伦、梁方津、梁桐等谈话，布置他们赶快开进山区“打游击”。上述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这几个县溃散时潜伏下来的“官兵”、旧军政人员、恶霸地主和惯匪暴乱的直接组织者。四、冯璜布置沿江几个县“打游击”任务完后，1949 年 12 月 7 日又窜到桂平县南区与罗活（桂南军政区司令）、卢士林（桂南军政区副司令）杨创奇和李本一（衡宝战役被我歼灭的桂系王牌第七军军长）等策划新的阴谋。据说冯璜还带了一大笔活动经费给罗活，帮助罗活逃到香港、台湾。冯璜潜伏到容县老家天堂山，被我进剿大军逼得走投无路，在 1950 年 1 月 17 日才到我容县军管会自首。

（三）解放后潜伏在大瑶山地区作垂死挣扎的主要股匪。

1、在剿匪中，我们活捉到甘竞生（原桂东军政区副司令）后，他交代了他给已经逃到台湾的原桂东军政司令其叔叔甘丽初的求援信：“日如叔尊鉴：东湖一役别后，侄即率余部转入金秀瑶山基地，策动游击转战经年……桂东军政区现辖1个军、14个独立团……目前游击区主要工作……打击其农会民兵之组织。使其工作无法推行。刻下游击区最要补给者为弹药之补充。请叔台就近报告领袖，从速接济，并望即速返桂主持。现在金秀瑶山基地开设空投场一个……。宗侄竞生。旧历8月5日”。信中牛皮吹的不小，基本上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其处境很狼狈倒是真情。另外，甘竞生还交代，余铸于1949年12月广西解放后，即拉拢交警称粤桂边区游击纵队司令于象县的中平、大乐，失败后返鹏化就食各地，而至大黎。林秀山于解放前在榴江、柳江山区为匪……后收集开山客人，……扩大而称司令；原一七六师副师长李丕成（桂平人）闻说去年五六月间称军于十八山；杨创奇去年8月自香港回……在大黎成立第三方面军总部……”从甘竞生交代的这些材料看，白崇禧集团的有关军政区溃败时，潜伏到大瑶山地区组织土匪暴乱，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余铸股匪

余铸是平南县南荫乡人。国民党陆军军校第四分校（在宜山）、贵州三合军校毕业。国民党贵州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励志社中校教官。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辕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广九路及湘桂路交通警察大队长，专事陷害广九、湘桂铁路沿线我地下工作的同志、进步分子及爱国青年学生。当我解放衡阳时，余撤到桂林任新七军第二师上校政工处长，不久撤到柳州，白崇禧集团又任命余铸为粤桂边区纵队少将副司令。收容国民党从桂林溃败下来的钟华英、赖汉民部为独立一旅，杨省堂部为第二旅，还收编了五十六军两个营和一部分交警建立几个独立团。12月份开到象州县中平乡，准备进大瑶山打游击，被我解放大军打败，大部被歼灭，余铸带交警总队几十个骨干潜回平南县家乡过春节。接着，余铸就利用粤桂边区纵队的牌子招摇撞骗，勾结平南和桂平县邻近乡村的官僚、恶霸、地主惯匪黄留琼、区爵生、张国材、潘乙朝、潘仲华、郭廷辉等，组织土匪暴乱，杀害我农村干部和农会会员。仅平南县的同和、水晏、八宝、安全四乡，就杀害了干部8人，农会会员100余人。竟然成立伪平南县政府，余铸自任县长。还在藤县大黎乡办特务训练班两期120多人，专门进行破坏活动。余铸与杨创奇的伪第三路军总司令部勾结上后，余铸被委任为新编第一军中将军长兼独立第一师师长，副师长韦佳（南宁人），直辖8个支队，共400余人。余铸股匪活动范围主要在桂平、平南和藤县交界的大瑶山区。

3、林秀山股匪，主要活动在柳州地区的象州、修仁，雒容、榴江（略）。

（四）白崇禧集团派特务到大瑶山地区组织土匪暴乱主要有两股：

1、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反情报参谋罗绍章，于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前夕，奉白崇禧之命，窜回大瑶山潜伏，化名罗四维。1950年1月，进入桂平县木山乡十八山，串连“瑶王”李荣保，取得李的信任后，以木山乡副乡长的名义，掩护其特务身份进行活动，他在十八山找到黄钜英（武宣县长），唆使黄纠集残部在武宣东乡组织土匪暴乱；到桂平县碧滩罗六垌策动原一七四师副师长李丕成，纠集其残部到象州县东布乡滴水村组织土匪暴乱。1950年6月，罗绍章以瑶王李荣保的名义，分别到平南、藤县各地串联。1950年10月罗与大鹏恶霸、惯匪张国材、张毅勇、张智勇等

勾搭，利用张国材收容柳州交警总队数十人枪，组成“鹏化反共救国师”委张智勇任师长。策动惯匪张国材进到象县滴水村，组织象县伪政府，张国材任伪县长。他们到处打家劫舍，勒收行水，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桂平县的碧滩、南埭、大宣，武宣县的东乡、平南县的鹏化、思旺等乡村，深受其害。12月，罗绍章窜到藤县大黎，与杨创奇股匪合伙作恶。

2、杨创奇股匪

国民党一二九师杨创奇部从梧州撤到桂平南区，1949年12月被我大军歼灭了。杨化装潜伏在木根乡里。他在1950年春逃到澳门，通过胡能定（原梧州市警察局特务），和李品芎（李品仙的胞弟）的关系，在香港找到罗活，与罗在香港勾搭，结果，罗活、白崇禧派遣他回大陆“打游击”。杨创奇接受任务后，把电台和密码交特务郑英运回梧州转藤县大黎满德昂（桂平人，原国民党特务，别动队大队长）收，然后在1950年夏，杨与郑英潜返藤县大黎。

杨创奇到藤县大黎、大旺圩后，首先与冯璜派到瑶山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卢英龙（原梧州市警察局长）、区爵阶（当地恶霸地主）接头，然后和杨克强（原国民党一二五军参谋长，解放后潜逃香港，接受汤济和罗活派回大瑶山活动）。

接着杨创奇、卢英龙、杨克强到平南县鹏化乡与满德昂联系会面。将原先寄回的电台与香港罗活联系。然后到桂平紫荆乡与特务匪首罗绍章、刘谨堂、梁秉刚、黄钜英、黄寿春、李荣保、陈宪章、张国材等会面。杨创奇传达罗活奉自崇禧派回大瑶山地区活动的任务；商议把大瑶山地区各股土匪统一改编问题等等。

1950年12月1日，杨创奇把大瑶山地区各匪首（原桂东军政区甘竞生和桂中军政区林秀山股匪在外）在藤县大黎召开“会议”。宣布罗活的“命令”，成立“反共救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罗活（原桂南军政区司令、国民党第三兵团副司令。住香港、台湾），副总司令王景宋（平南人。原桂中军政区司令。柳州将解放时，王匪率1000多人逃到贵县石龙、樟木乡一带，被我桂中支队第二十九团阻击，解放大军一三三师追击部队赶到，一举全歼该匪部，王匪被俘，上送时被他逃脱到香港转台湾）、参谋长朱试武（昭平人，原昭平县长）、政治部主任杨光（即杨克强，湖南人，原梧州高中上校军训主任、CC特务）。

该匪总部所辖股匪主要有：

匪总部警卫团：团长冯震坤（桂平人），该团约100人，轻机枪4挺、冲锋枪卡宾枪约20支、步枪40支。

匪四十八军，军长杨创奇（玉林人，原国民党五十六军二二九师师长）、副军长卢英龙（梧州人，原梧州警察局长）、刘谨堂（桂平人，紫荆乡大恶霸）、参谋长杨克强（桂平人，原国民党一二五军参谋长）、副参谋长郑英、罗绍章（桂平人，特务）。

匪新编第一军，军长余铸（平南人，军统特务），参谋长欧阳松、政治部主任谢品一（师长）。

匪一七一师，师长李丕成（桂平人）、副师长李荣保（桂平木山乡人、“瑶王”）。

匪一七三师师长卢英龙（兼）、副师长陈博（藤县人）。该股匪主要活动在藤北的大黎、太平和桃花山一带。

匪一七四师师长徐威卫（梧州人，国民党友宁军校毕业，原梧州市自卫团团团长）、副师长邓恭岳（藤县人）。该股匪主要活动在苍梧县与藤县北交界一带。

匪一七五师师长刘家志（桂平县人，原国民党八十三军营长）。该股匪主要活动在平南县同和、水晏等乡。匪一七六师师长满德昂（桂平人，军统特务）、副师长吴柏祯（平南人，军统特务）、张国材（平南县鹏化乡人，惯匪。大瑶山地区土匪首先暴乱者之一）。

匪一八三师，师长廖冠武（平南人）、副师长林辉（平南人）。

匪三二九师师长刘谨堂（兼）、副师长梁秉刚（桂平人）、参谋长黄寿春（桂平人），该股匪除梁秉刚从桂平县河南带徐立三（桂平人）、杨文荣（桂平人）、梁刚（桂平人）三个团长入枪约200人到紫荆外，刘谨堂没有什么力量。

匪三三〇师，师长陈昭岳（空名）。

匪独立第一师，师长余铸（兼），副师长韦佳（南宁人）。该股匪有潘乙朝（平南人）等8个队伍的番号。

匪独立第二师师长朱试武（昭平人，原昭平县县长），副师长王晟（安徽人，原国民党桂东军政区警官）、参谋长朱家祥。该股匪主要活动在昭平县武河、马江一带。

匪独立第三师师长胡家龙（藤县人）、副师长梁树彬（藤县人）、参谋长钟群。该股匪原属甘竞生股匪委派的独立旅，杨创奇把它改编为师。入枪三四十，轻机4挺。活动在藤县南北。我们重点进剿藤南时，他们跑进藤北大瑶山。

匪独立第四师，师长陆尚武（修仁县人）、副师长陆云腾（象县人）。

匪独立第一旅旅长何武（昭平人）。

匪独立第二旅旅长杨忠海（平南人）活动在平南县大桂山一带。

匪总部直属第二团，团长赵英甫（平南人）、副团长赵杰豪（平南人），该股匪入枪五六十。

总起来说，活动在藤县、平南和桂平3县所属大瑶山地区的主要股匪共有“两个军、12个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独立团。入枪不及2000。因粮弹无着，经费没有，所以番号虽多，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是匪首杨创奇被俘后，经过我们审问交代的数据。根据我们俘虏其他主要匪首如余铸和投城的匪首罗绍章等交代，以及从我军分区进剿大瑶山股匪的战果来判断，杨匪交代上述股匪情况，基本属实。

二、剿匪经过

第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1950年12月17日，梧州地委和军分区成立剿匪临工委（即剿匪指挥所），由军分区政委曹传赞任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程启文、副司令员廖联原任副书记，剿匪重点区的藤（县）平（南）桂（平）3县，分别成立了剿匪临工委。藤县张开城、平南县罗克明、桂平县莫福枝分别为各该县临工委书记。在临工委领导下，党政军民财统一组织了临时工作组，把重点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政机关干部80%参加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军队机关干部70%以上深入剿匪部队，做到“首长上山，干部下连”，战斗部队的成员，做到“既是战斗员，又是工作员”。

第二，统一思想，明确做法。

我们坚持以毛主席关于广西剿匪的指示，和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为指导，对前段剿匪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通过谈经验，找教训，提建议的方法，统一部队、地方干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剿匪部队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克服前段时间剿匪中的缺点和错误。

使大家懂得，结合地方发动群众进行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扭转和克服过去单纯军事进剿和“宽大无边”的不恰当做法。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从而党政军民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极大地激发部队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有力地调动广大参战民兵和群众的剿匪积极性。

第三，掌握匪情

在重点进剿时，我们经过反复侦察，认真调查研究，基本上掌握了大瑶山股匪的基本情况：（一）杨创奇、卢英龙股匪四十八军总部，及其警卫团（团长冯震坤）100余人，主要在藤县的大黎和花州一带。该匪与柳州地区股匪林秀山联系，主要在大瑶山、天堂山周围的罗六、罗丹、罗运、六巷和青山一带；与桂东方面的股匪甘竞生部联系，主要在藤县的大黎，花州、蒙山县的陈塘和昭平县与藤县交界的古龙一带。（二）余铸股匪本部在平南县同和乡与藤县大黎乡交界处，警卫力量几十人枪。（三）黄留琼、韩蒙轩股匪是恶霸地主的狗腿子流氓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主要活动在平南县同和、官城交界处。（四）张智勇、张国材股匪，主要在平南县的鹏化、思旺和桂平县的督的乡一带。该匪有100多武装，卡宾、轻机枪不少。因是由惯匪和部分溃败潜伏下来的交警组成，顽固性强。（五）刘谨堂、梁秉刚股匪，主要活动在桂平县的紫荆、碧滩一带。刘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是我在江南重点剿匪时，梁匪带了100多武装窜到大瑶山与刘匪结伙。（六）李丕成、李荣保股匪，主要活动在桂平和木山乡和大藤峡一带。该匪有几十支枪。（七）胡家龙股匪，有几十人枪。原在藤县南安一带活动，我重点清剿江南土匪时，窜到藤北、濠江、太平一带的。

这些股匪的特点：一、各霸一方，没有统一的指挥。二、交通联络不灵。三、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尖锐对立着。四、粮食、弹药没有供给，靠抢劫维持生存。

第四、远距离奔袭与分兵铺开驻剿相结合

1951年1月8日开始，我军分区直接指挥4个团3个县大队的进剿队伍，按照既定部署，统一行动，实行远距离对各股匪营地奔袭，并把它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之。由于我军重点重兵进剿，力量强大，敌人不堪一击，在进剿后5天之内，（1951年1月12日）上述主要股匪，有的被消灭了；有的各自逃命；有的企图分散、潜伏下来继续与我周旋。例如杨创奇被俘后交代：“旧历十二月初二（即1951年1月9日）早，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入大黎，除以伪县府发枪抵抗外，所有人士听闻枪声后，均狼狈逃跑……本人由大黎逃出后，向西北逃跑。所有伪军部人员，均失散不见，卢英龙、郑英、朱试武、杨光当时未知下落。……我逃到平桂乡地方……随行者10多人，枪支甚少。”

根据进剿作战结果和敌情的变化，从2月3日起，我们决定所有进剿部队，立即“分散铺开，驻剿清剿。”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彻底粉碎了大瑶山地区的股匪。用杨创奇的话来说：“我带梁（秉刚）冯（震坤）两部向西逃窜，……将到达象县中平西南之村落……遇解放军的步哨，开枪一打，队伍就乱了，冯震坤部及军部人员仍向西逃走，梁秉刚部向后逃跑……我个人……到了翌晨（农历元月初四即1951年2月9日）解放军出来搜索，我即被俘。……冯部在十四冲，梁部在中平附近山地已全部被解放军消灭。冯震坤、梁秉刚两匪首均被击毙，至此伪四十八军的土匪已告消灭无余。杨创奇股匪的下场，也是其它股匪的下场。”

第五、封锁江防和封锁交通要道

封江封路是配合进剿部队消灭土匪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在部署进剿部队进剿的同时，军分区指挥所将有关主力团、各县公安局和县大队组成封江封路指挥所，负责制订封江封路各项具体规定和实施。从主力部队抽调适当的骨干配合各县公安局、县大队和广大民兵，组成封锁交通要道和江防两条封锁线的兵力。控制好通往大瑶山的一切通道，使大瑶山内的敌人不能外窜；控制好沿江 300 多公里的来往船只，使江北岸之敌不能逃到江南。

封锁大瑶山内外一切交通要道，使敌人在我进剿部队远距离奔袭和驻剿期间，被围困在山里就歼或逃出来被守卡部队和民兵消灭。例如，1950 年 1 月我进剿部队占领土匪本营所在地大黎后，匪四十八军副军长卢英龙被围困在大黎的青山上，身上虽然带有 50 多两黄金，但买不到食的，加上那儿天下雪，卢匪全家都饿、冻死在山上了。又例如匪新一军军长余铸，1 月 18 日由大黎带其残部 50 多人，逃到藤北太平乡西北边的石山上，被我四六二团飞行队追击打伤右腿，余部师长谢品一和五六个匪众扶他逃到旺龙乡和平村时，被我守卡民兵打死该匪旅长河鼎和其余匪众，活捉了余铸和谢品一。

关于封锁江防方面，军分区按照军区指挥所李天佑副司令员的亲临指示，指定四六二团二营负责，组织苍梧、藤县、平南和桂平 4 个县公安局、县大队 600 余人和几千民兵从 1 月 8 日至 2 月 28 日，封锁了从桂平县的大藤峡到藤县的赤水 300 多公里的江防，控制一切来往船只和鱼船，严密封锁大小口岸。在封锁口岸期间，土匪企图南逃，被我截击的战例 40 多起。例如，我进剿部队奔袭大瑶山里股匪据点后，匪独立第二师副师长王晟、旅长何立中，率其残部企图南逃，刚到藤县平福乡下莫四村，被我江防部队和民兵堵歼，计打死王晟以下匪徒 60 名，打伤 12 名，俘虏匪副团长黄锦国以下 40 名。又例如，匪独立第三师师长胡家龙，1 月 15 日率其残部 200 余人，逃窜到藤县蒙江，想逃回藤南其老巢，结果被我封江部队和民兵发现，经过三天三夜拉网搜剿，全歼了该匪，胡家龙被打伤后，和其旅长莫昌朝束手就擒。

总之，封路封江措施，对剿灭大瑶山地区的土匪，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六、发动群众清匪反恶霸

进剿部队消灭、击溃有关股匪，由进剿转到分散铺开驻剿后，主力部队即发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的作用，与地方的工作队和广大民兵开展群众运动，把反霸与剿匪结合起来。恶霸地主不但是广大群众血腥的压榨者，而且又是土匪的靠山，土匪的组织者。土匪恶霸狼狈为奸，对人民群众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人民群众，还胁迫群众为匪，弄得妻离子散，群众敢怒不敢言。为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恶霸地主斗倒，群众才能翻身，挖掉匪根，才能彻底肃清土匪。例如，我进剿部队占领桂平县紫荆、木山等乡后，李荣保利用封建的民族关系，跑入深山里隐蔽起来。我们经过发动瑶族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对土匪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通过瑶民群众对李荣保进行政治争取工作。1951 年 2 月底，李荣保终于带着全家老小下山缴械投诚自新了。又如，柳州地区主要匪首林秀山及其纵队司令韦汉林，当柳州军分区和我们进剿部队占领该匪的老窝瑶山里的圣堂山一带以后，他们利用封建的社会关系，潜逃到藤县三江乡高山里。经过发动群众反霸斗争，群众阶级政治觉悟提高了，密报该匪的行踪，1951 年 3 月，林、韦两匪首终于被我五二〇团驻剿分队和当地民兵

活捉归案。桂系地区的匪首甘竞生，也和林秀山等匪首一样，终于被我活捉，并于1951年5月18日，在梧州公审后枪决。

经过两个多月对瑶山地区的股匪进剿、驻剿和清匪反剿斗争，我们按原部署歼灭了大瑶山地区的股匪，绝大多数的匪首均已落网。提前完成了省委和军区党委交给的任务。这一重大的胜利，为下一步全面开展清匪反霸，抓净散匪潜匪，挖掉匪根，进行土改，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基本战术

大瑶山位于柳州、梧州、平乐、桂林等4个地区12个县的交界处。南北150余公里，东西50公里，北与小瑶山相连，成为桂东北的中心地带。由于瑶山所处的环境独特，区域辽阔，山峦叠嶂，林密人稀，地势险要，交通闭塞，甚至无路可走，具有易守难攻和便于机动的军事地理性点，所以，历来为盗匪盘踞和出没频繁的地区。性别是1950年10月，在我桂东南实施重点剿匪之后，其他地区的主要匪首和骨干分子，纷纷窜聚于大瑶山地区，实际上形成了匪在桂东北地区的指挥和活动中心。因此，消灭大瑶山的土匪，就成了全省剿匪作战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成了我们在桂东北地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生产建设的一个艰巨而特殊的任务。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剿灭大瑶山地区的土匪，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鉴于大瑶山区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到处是悬崖峡谷，交通全靠两条腿；还有土匪出没无常，行踪诡谲；山上聚居的多为少数民族，住地分散，生活穷困，加上对解放后我党的政策不甚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军在大瑶山剿匪作战中，既不能照搬野战军大部队的作战方法，也不能象过去在敌后打游击那样的打法，只能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实战中，创造运用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战术。

其一，进剿大瑶山股匪作战之前，先对大江南岸的土匪重点进剿，对江北之匪则采取不理态度，即不封江封路，有意地网开一面，让江南的顽匪跑向江北的内部，以便最后集中兵力，张网捕鱼，聚而歼之。

其二、进剿的主力团、营，除留预备队机动外，以连或排组成分队，短小精悍，按预定目标，实行远距离奔袭。各分队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一举歼灭被我包围之敌。

其三、对狡猾的敌人，在我进剿分队未到达前，为了逃避被歼灭的命运，早已分散、潜伏起来。我进剿分队立即主动分散铺开，驻剿清剿，决心不全歼土匪，绝不收兵。

其四、组织“飞行小组”。进剿部队转入驻剿清剿以后，各个分队根据实际情况，组成捕匪“飞行小组”，配备自动火器，发扬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分昼夜，不分地区，分工专门捕捉匪首和匪骨干分子。这样的办法，十分凑效，如甘竞生、林秀山、陆当武等重要匪首，就是四六一团的飞行小组和民兵追捕擒获的。

其五、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和依靠广大指战员，创造与运用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具体战术和捕匪办法。例如孤胆独行，一人一路；村村有工作队，山山有解放军；可疑就问，发现土匪就追；你来我往，互相穿插；堵住土匪活动的空子。结果，所有的土匪藏不住，吃不饱，跑不了，一个一个的被捉。我们就是这样，积小胜为大胜，胜利完成了剿灭大瑶山地区土匪的任务。

1987年8月

解放初期广西剿匪之我见

李祖尧

一、广西剿匪概况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

1950年1月25日，国民党退役中将钟祖培纠集2800余名土匪在恭城举行反革命武装暴乱，攻打我县、乡政府，抢劫公粮，杀害我驻各乡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接着，平乐、玉林、柳州、宜山、龙州、宾阳等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武装暴乱事件。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暴乱和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土匪有二百多股，约九万余人。

广西刚刚解放，如此众多的土匪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这不是偶然的，除了有其历史原因外，主要是国民党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策划的。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情况复杂，历史上就是一个“司令满街走，统领多过狗”的多匪地区，一些流氓地痞及不良分子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为找出路，落草山林，以匪为业，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甚至与官府相勾结，取得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得势为官，下野为匪。同时，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军阀政客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反革命老巢。他们从1930年开始，打着“建设广西”的旗号，建立了一整套反动统治机构，极力推行“自治、自给、自卫”和“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反动政策，培训了三十多万村、甲长以上行政人员；向人民群众灌输“大广西主义”毒素，制造排外情绪；在农村普遍建立民团，组织联防，这些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并且拥有大量枪支。据估计，解放前全省有“民枪”约60余万支（其中有15万支是白崇禧退出广西前夕有计划地留下来的），平均每县有2000支以下。因此，在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的时候，国民党便寄希望于广西，妄图利用广西特殊情况作为他们退出大陆后的根据地，与我开展长期的地下斗争，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省内在职和退职高级军政人员紧急会议，布置实施“总体战”将部分国民党正规武装、伪行政人员和特务潜留省内，并以此为骨干，同时网罗各地游匪散将，设立桂北、桂西、桂东、桂中南，桂滇边五个军政区，发动所谓“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在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大明山、四十八崙和大小瑶山建立根据地，开展所谓“广泛的游击战争”当时潜留下来的国民党正规武装和伪行政人员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桂滇边军政区司令张光玮，桂北军区司令黄绍雄，一二六军军长林秀山，靖西专员赖慧鹏，以及国民党一七二师、三二九师、三十七师、三十八师一〇〇军残部等，计33000余人。这些反动武装，除周祖晃、莫树杰，张光玮、赖慧鹏等部被迫先后投诚自首外，其余均潜伏在桂北、桂东、桂中南、粤桂边等山区为匪作乱。为根除匪患，保卫新生革命政权，广西军民根据党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指示，于1950年1月至1952年12月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广西剿匪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月开始至1950年9月止，主要是追歼国民党残余正规军，镇压土匪武装暴乱。在这阶段由于领导上、政策上、军事部署上等原因，剿匪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效果很不明显，甚至给土匪以可乘之机；第二阶段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止，主要任务是集中全力，重点剿匪。在这期间，整顿了省委和省军区领导班子，并就军

事部署、剿匪政策等方面作了必要调整和修正，使剿匪工作获得很大的胜利，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第三阶段从1951年6月至1952年12月止，主要任务是清匪反霸肃特，巩固社会治安。在这阶段，我军乘胜追击，全歼了隐藏之残匪，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广西剿匪，我军投入兵力22万余人，民兵和地方武装17万余人，共歼匪46万3千余人。

二、剿匪初期，为什么土匪越剿越多？

1950年1月土匪在恭城暴乱以后，广西省委和省军区率领全省军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匪乱的斗争。至5月上旬为止，分别在思乐镇龙山区，绥淦、宾阳地区，桂东南山区，临桂、两江地区打了一些歼灭战，共歼土匪四万余人。但在此期间，由于匪乱发生突然、普遍，我思想准备不足，部署零乱，政策不力，因此就全省来说，还未形成有战略意义的剿匪作战，没有给土匪以歼灭性的打击。所以，全省形势仍十分严重，特别是5月中旬后，土匪趁我军整编和春荒困难之机，集零为整，扩大队伍，整顿组织，统一编制番号，再度进行暴乱。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我群众基础较差的边远县份、偏僻山区、组织反共联防，强迫群众为匪。一时间匪势激增，气焰猖獗嚣张。武鸣军分区一个区政府、三个乡政府同一天遭匪袭击；龙州军分区万承县八个乡政府被匪特毁掉四个，控制两个；宜山军分区一千余个村庄，被土匪控制370多个；尤其是伪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方一引，公然在南邕近郊那陈村扯旗办公，征粮征税。匪乱一直延、续到10月份我军冬季重点进剿方止。在一至九月的土匪暴乱中，据不完全统计，全省179个县、区、乡政府遭围攻，5100百多人被土匪杀害，损失公粮2800百多万斤，牲畜26000余头，毁坏民房九千余间。

广西匪乱的严重局面之所以未能及时扭转，而且土匪越剿越多，越剿越猖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剿匪政策不对头。广西土匪内部大多是国民党正规武装、特务、伪行政人员、恶霸、地主、历史土匪，这些人对革命极端仇视，是一伙亡命之徒。必须贯彻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剿匪政策，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放的放。然而，剿匪时，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未充分认识这一点，在部队中只片面强调宽大政策，该杀的不杀，该关未关，有的一捉就放，有的捉放达五次之多，甚至对一些首恶、顽固的土匪头子（如恭城武装暴乱的土匪头子、原国民党中将钟祖培）被我抓到，也仅教育一番就释放了，使得这些人回去后又继续当土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种宽大无边的政策，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实践证明，盲目地讲宽大政策，不仅使土匪肆无忌惮，更加猖狂，而且使我们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压抑了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我军的士气。

二是剿匪的军事部署和战术运用不对头。广西土匪大部分分布在十万大山、大容山、大明山，四十八？、大小瑶山以及边远山区，力量相对比较集中。因此，在部署我军兵力时，应当采取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各个击破的方针；在战术的运用上，要匪变我变，即当土匪集中时，我们也应集中，土匪分散时，我们也应相对的分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各个歼灭敌人，但当时我军的兵力部署有些平均主义，实行“分片包干”，即班负责村，连负责乡，营负责县（大县由团负责），把兵力分散在各村、乡、区、县。由于兵力分散，当土匪袭击、围攻时，不能组织有力的还击；一旦发现股匪后，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予以歼灭。致使我军陷入被动，经常挨打，而土匪则到处流窜，煽动暴乱，为所欲为。在战术上，用老一套的大兵团正规作战形式，缺乏山

地、山洞作战经验，结果匪徒趁机漏网。加上情报工作、后勤工作跟不上，所以，经常扑空，收效甚微。

三是收缴枪支不够及时不够坚决。解放初期，广西全省有大量枪支掌握在土匪、恶霸手中，群众也掌握了一部分。对此，一些领导认为，广西地处偏僻，土匪多，人民群众手中的那一部分枪支是用来自卫的，不能收。虽然也有些领导主张坚决收缴全部枪支，但没有得到支持。因而收枪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土匪常常化装成普通群众，匪民难分，这是其一。其二，人民群众手中的枪一旦被土匪抢走，就会为匪所用。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把民间的枪全部收缴是必要的，否则，就会给土匪暴乱提供有利条件。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土匪为了扩充他们的势力，的确抢夺了一部分群众用于自卫的枪。

四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解放以后，虽然在部分地区也进行了减租退押运动和建立了一些农会组织和民兵组织，但是由于重视不够，相当一部分农村都没有建立基层政权和开展清匪反霸工作，农会组织和民兵组织也不够健全。加上有的剿匪部队骄傲自满，只是单纯军事进剿，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因此，大部分人民群众尚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且政治上也没有获得彻底解放，加之生活困苦，因而腰杆子硬不起来，致使部队一走，土匪又卷土重来。

五是领导思想方法不对头。随着剿匪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匪势一度有所收敛，领导上错误地认为土匪已基本消灭，过早地作出了以驻剿为主的部署。而省委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地方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征粮上，放松了对匪特的打击和对匪乱的警惕。同时，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党政军名誉上是一元化领导，但实质上却思想有些分歧，互相配合不够。因而造成了地方工作无军队支撑，部队行动无民众配合的脱节局面。另外，没有很好依靠原来党所领导的地下武装，一些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对地方情况很熟悉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不仅得不到重用，有的甚至还被解甲回乡，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主观上有一定程度的宗派主义情绪。

三、1950年11月，广西第三次高干会议后，剿匪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果，这又是为什么？

对于广西剿匪，党中央是十分关心的。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两次来电报批评前段剿匪收效不大，明确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又指示要总结剿匪斗争经验，明确剿匪重点，掌握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改进领导方法。并要求1951年“5月1日前彻底消灭广西股匪”。

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50年11月底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了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参加了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并对广西剿匪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认真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方针政策，纠正了错误。

这次会议以后，全省军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使剿匪工作收到了明显成效。至3月中旬止，全省共歼匪18万余人，收缴枪支22万余支，有71个县基本消灭股匪，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其主要原因是：

一、加强了领导。为从根本上扭转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1950年10月，党中央指派叶剑英、陶铸、李天佑同志主持广西省委和省军区工作，并实行一元化领导。同时，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深入地调查研究，从而把握了剿匪的主动权。省委和省军区领导还决定把剿匪工作摆在

一切工作的首位，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全省上下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剿匪总体战。基本扭转了剿匪工作的被动局面。为此，毛主席分别于1951年1月2日和5月16日两次打电报嘉奖。

二、贯彻执行了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和采取措施坚决收缴民间枪支。对土匪恶霸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斗的斗，该放的放，政策严明，决不含糊。对所俘营长、县长、情报站长、大队长以上匪首，就地公审，对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匪首和一些亡命之徒坚决镇压。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对主动投降自首的土匪给予宽大处理。重点进剿两个半月，仅投诚自首的土匪达42082人，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气焰，削弱了土匪的力量。同时军队和地方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众，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大力收缴了民间枪支。前后八个月共收缴各种枪支（包括缴获的土匪枪支）40余万支，彻底根除了匪土赖以存在的基础。

三、实行了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第三次广西高干会议，确定以桂南和大小瑶山为全省重点剿匪区，暂时放弃三江、天峨、思恩、罗城、田西、西隆、西林等十个边远县份，以集中兵力加强重点地区的剿匪力量。在此同时，中南军区于1950年12月将驻湖南的二十一兵团调入广西剿匪。加强剿匪力量。1950年12月19日，我以17个团的兵力进剿桂南地区。经过两个半月的进剿，共歼匪64000余名，收缴各种枪支96000余支。同时，我又以14个半团的兵利于1951年1月8日开始会剿大小瑶山地区。3月中旬结束，共歼匪48030余人，四大匪首林秀山（一二六军军长）、韩蒙轩（反共救国军司令）、杨创奇（四十八军军长）、甘竞生（桂东军政区副司令）和其他重要骨干无一漏网，全部被歼。

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巩固基层政权。在剿匪的同时，省委及时派出数千名随军工作队进驻大小瑶山等群众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部队也将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以班排为单位分散进驻各区、乡，配合地方工作队开展工作。接着，发放粮食、生产资料，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帮助建立健全农会、民兵组织，逮捕匪霸，发动群众斗匪反霸，诉苦伸冤，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减租退押。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积极参加反霸斗争，协助我军剿匪清匪。我军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部队和民兵中广泛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奖励和宣扬剿匪有功的指战员和民兵、群众，从而调动了广大指战员、民兵、群众的剿匪积极性，使土匪陷入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伏手就歼。

五、积极做好统战工作，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分化瓦解敌人。对投诚自首的上层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一定照顾，利用他们做中、下层头头的工作。同时开展了广泛的规劝活动，发动匪属和匪的亲朋好友做土匪的工作，促使土匪内部分化瓦解。

（龙月欢整理）

四十八崙捣匪巢

于振河

1950年10月，我步兵第二一五师奉命参加广西剿匪。

二一五师是由长沙起义的一部分原国民党军和我军抽调的领导骨干，建制单位改编而成。经过一年的政治整训，生产和民主两大运动，部队从政治上与组织上得到基本改造，首次受领党和

上级赋予的光荣任务，全师上下无不感到鼓舞。我们受命之际，正当我志愿军出师朝鲜，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土匪是美、蒋妄图重返大陆的爪牙和内应，彻底消灭土匪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纷纷表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在完成任务中锻炼与考验自己，争取早日向主力看齐，因而激发了剿匪立功的高涨情绪。10月8日举行全师誓师大会，12日由湘南出发，18日到达指定地区——广西雒容、鹿寨一带集结待命。

根据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对桂北剿匪的统一部署，命我师先行配合兄弟部队肃清大小瑶山的匪患。这一地区的土匪，虽经我南下大军的屡次打击，但凶焰尚高，有匪首甘竞生、林秀山和反动瑶王李荣保等大小30多股土匪云集于此。他们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蒋要反攻大陆”的欺骗宣传，造谣惑众，收掠民枪民财，企图凭借险要复杂的有利地形，等待所谓的“时机到来”。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向雒（容）榴（江）象（县）北修（仁）西地区重点进剿。从1951年元月10日起，我以六四四团及六四三团、六四五团各一部，经过重点进剿，分兵驻剿，发动群众，部队战高山，斗严寒。披荆斩棘，忍饥受饿，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至2月底基本完成任务，歼匪4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匪首98名。

初战获胜，使我们这支新改编的部队经受了锻炼与考验，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不仅从土匪残害群众的暴行中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政治本质，而且对党和上级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紧密结合”的剿匪方针与原则政策有了深切的体会，也摸到了土匪活动的规律和战法，更加坚定了剿灭土匪的决心和信心。正当我们召开师党员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明确部队建设的方向，为继续剿匪作思想动员时，上级又把捣毁四十八崙股匪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四十八崙地处鹿寨县中渡区（当时为中渡县），与融安、永福等县接壤，是桂北一个重要的土匪老巢。崙区地形极为特殊，山多为梯形，山山相接，洞洞相连，山间刺松遍野，草木丛生，能通行的道路很少。崙区人烟稀少，居民点有200多个，小则3至5户，大则30至50户。国民党统治时期，李、白、黄反动集团曾在此经营多年，从大陆撤退时有意安插军政要员，纠集其正规军残余部队与特务、旧军官、惯匪、地主恶霸，企图继续经营巢穴。主要匪首“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系大地主兼在乡军官，其副司令兼一二八军军长向天雷和第三兵团副司令潘荣斋则是1950年9月由国民党从香港派回来的。随着我军剿匪的深入进行，各地漏网的匪首和匪众都云集于此。他们的统治手段十分毒辣，对匪众施以“连环保”，“缴枪投降者杀无赦”，在我们进剿前就杀了一批曾向我投诚自首过的匪徒以示众，对群众则实行武、政、教合一，组织全民自卫队，强迫群众空室清野，“人上山，狗入洞”，制造民匪不分，破坏道路，构筑障碍，企图与我对抗。

为彻底捣毁四十八崙土匪老巢，全歼内顽匪，根据瑶山地区剿匪的经验和四十八崙的特殊地形，我们决定采取多路多点进剿，以形成“拉网式”的合击，使崙内匪徒无隙可乘。在柳州军分区的密切配合下，我师于51年3月18日夜间分兵17路向内突然发起进剿，20日拂晓打响。当时正值雨季，淫雨霏霏，夜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翻山越岭，爬峭壁，涉山洞，手脚划破，棉衣湿透，行动十分困难。但为把土匪消灭在各自的指定地域，个个奋不顾身，凭借绳子和绑腿带上拉下吊，终于按时向匪徒发起进攻，预定打的地方都打到了，争取进剿的主动。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六四四团六连在营长武福有率领下，出敌不意地翻越右湾山，

直捣屯秋寨向天雷的一二八军指挥所，凌晨4时进至寨脚时（距屯秋约两华里），匪哨兵发现我尖兵班系北方口音，当即鸣枪报警，被我击毙。匪大队长洪英武闻枪声率部众向我扑来。武营长即命指导员高超带领三排还击寨脚之敌，他与郭连长率领一、二排直扑屯秋，可在屯秋只捉住一些零散匪徒。于是迅即追回寨脚同三排会合，只见寨脚除留匪大队长和一些匪徒的尸体外，其余匪众均已不见踪影。他们审讯抓获的匪徒得知，匪首何次三、向天雷已获悉我大军包围四十八寨的情况，头天晚上在山脚召开各股匪首会议，提出三点对策：1、凭借有利地形顽抗；2、向北突围到贵州、云南边界等待时机；3、分散到柳州、柳城、鹿寨一带隐蔽活动。最后决定分散突围进行隐蔽活动。会议结束后就在寨脚过夜，刚睡下不久，闻到枪声即狼狈逃窜。我们发现，有一所房子内灯光昏暗，杯盘狼籍，烟头满地，桌椅翻倒，确似匪首聚会之所。是时，天还没亮，为防止匪徒反扑，武营长即命六连抢占屯秋附近有利地形，轻重火器齐射20发，以威慑敌人。天刚蒙蒙亮，教导员黄大贵带四连和炮连赶到，经研究决定乘匪官兵分离的时机，拉网搜山。六连和炮连采取拉网摸鱼的战术，把屯秋寨象梳头一样梳了几遍，抓获数百名散匪和一些小头目。四连进入同前寨，正遇到一股从屯秋逃出的匪徒向一座陡峭的石山上攀登，三排长李廷甫率战士猛扑上去，遭到匪徒的顽抗，他沉着指挥，以顽强的毅力和巧妙地组织火力，边追边打，一毙敌9名，伤9人，俘8人，将这股匪徒歼灭。在同前寨，四连还抓获匪“桂中军政区”五支队副司令罗安庆和一些散匪。该团八连担负着捣毁匪“桂中军政区司令部”的任务，他们摸进寨口进至斗跃时，兄弟连队已同斗跃的敌人打响。连长王光汉和副指导员杨廷甫乘机率八连直扑饭洞，村中却空无一人，只在附近抓获一些零散匪徒。天刚亮，他们看到饭洞对面山口有两匹军马，在山洞里搜出一布袋刻有匪“桂中军政区司令部”和何次三等匪首的印章，断定匪司令部已落慌而逃，何次三也不会跑远，随即严密封锁寨口，准备搜山。六四五团副团长阎候洪率一营二连和营部侦察班，先行摸进古里槽。古里槽匪“桂中军政区”即第六支队，约1000余人，配有重机枪和六〇炮，火力较强。他们一进寨就把古里槽的匪徒压入一个院内，经两个小时激战，匪徒誓死不缴枪，最后实施爆破，把房子炸毁，匪躲进一个大粪坑，被活捉70多人。据匪徒供称：“支队司令覃正辉头天夜里在此开会，说解放军要来打我们，你们要坚守古里槽，实在守不住就是跑死，也不要被打死。”拂晓闻到枪声，覃正辉带一部人从后山的洞里逃走。接着营部侦察班在猴子寨发现敌情，二连一鼓作气把逃至半山腰的匪徒围歼，抓获60多人。事后得知这伙匪徒是六支队司令部人员。随后又抓获六支队参谋长陶荣伟。

根据上述情况，师指挥所认为，由于我军突然发起进剿，匪屯秋会议未来及贯彻，其指挥中枢和组织系统已被我打乱，使匪首与匪众分离，一时难以收拢，遂命令各进剿部队，按指定地域严密封锁寨口和交通要道，在歼灭成股匪徒后，立即拉网搜山，山山设哨，路路设卡，村村驻军，把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争取基本群众，瓦解胁从人员，对寨区匪徒务必全歼。各进剿部队在歼灭成股匪徒后，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拉网搜山，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胁从人员，并积极动员群众回村，断绝土匪生存的社会条件。部队进寨后，许多村庄的群众都已外逃，我军不仅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而且派出分队或有组织的人员，打扫环境卫生，帮助群众养鸡、喂猪、放牧牲畜，管理秧田，有的还架上牛翻田整地。躲在山上的群众看到如此情景，先是派一些老人和妇孺回来试探，亲眼所见我军确是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大军，然后上山把乡亲们叫了回来。经过宣

传党和政府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与我大军压境“土匪不灭，誓不收兵”，剿匪决心，许多混迹群众中的土匪纷纷自首，交出了隐藏的武器弹药，不少群众还没上山入洞叫回了自己的亲人。搜山部队都设有宣传组和群众工作组，做到标语上山，传单入洞，对匪徒实行政策攻心，继续动员群众下山，改变民匪不分的局面。班、排、连都挑选战斗骨干组成人数不等的“飞行小组”，执行追捕远距离逃窜的匪首和匪徒的特殊任务。他们深入高山老林，白天搜山，夜间设伏，吃炒米，喝凉水，昼夜活动很少休息，实在困了就随地打个盹。有些匪徒十分狡猾，你上山，他入洞，你搜洞，他上山。我们就杀他“回马枪”，予以围歼，有的则据险顽抗，我们就将其围困在山上或洞中，组织火力强攻，用炮轰，用爆破，用烟薰，彻底歼灭之。有些部队在搜山中，以便衣作伪装，诱匪下山、出洞，将其捕获。在搜山活动中，部队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制约和重重困难，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六四五团四连在高坡搜山时，一股匪徒爬上山岩，缩在山腰一个没有出口的小石洞中，凭着有利地形及轻机枪作掩护，进行顽抗。爆破手夏保仁看到爬上山岩接近洞口的战友一个牺牲了，连里组织用竹杆绑着集束手榴弹送到洞口而被扔回来伤了自己人，用辣椒烟薰过也无济于事，于是不顾自己头部负伤的疼痛，硬是从侧翼攀登至洞口的顶端，用炸药包裹着手榴弹朝洞口扔下去，把匪徒全部埋葬在石洞里，该团二连在古里槽围歼一股逃窜的匪徒时，副炮手李门看到三名匪徒逃脱后爬上一坐百丈高峰，他凭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勇气，置生死于不顾，强行登上峰顶，把两名顽抗的匪徒击毙，又与一名匪徒展开肉搏，终于将其推下山洞摔死。六四五团六连战士丁喜保，在追捕逃匪中，从三丈多高的悬崖上跳下，左臂骨折三段，仍忍痛用右手将一名匪徒活捉。

经过几天的搜山活动，盘踞四十八畹的土匪基本瓦解，大部匪众已被我歼灭，并在屯秋、同前、莲花、龙登、龙口、高坡、五指山、古里槽等地抓获匪一二八军副军长陈右雄和该军组训科长兼政工室主任郝更生，第三兵团副司令潘荣斋，一二六军参谋长周绍芳（瑶山的漏网匪首），三十一师师长廖珊珊，六支队司令覃正辉等一批重要匪首。但主要匪首何次山、向天雷去向不明，还有一些重要匪首尚未抓获。因此，3月25日我与吴副军长来到平山六四四团指挥所，同团首长召集各营领导分析进剿情况，他们说已发现何次山行踪正在追捕中，但向天雷还未找到线索。外区战地捷报传向天雷逃出？区已被兄弟部队击毙，并登有照片。经仔细分析，发现照片特征与掌握的向天雷的情况不符，向天雷的左手小指有四节，与无名指一样长，而照片上的人都无此特征，同时，已抓获的匪首供称，前两天还有人在屯秋附近见过向天雷，他怎么能够在我严密封锁下逃至二百多里以外被兄弟部队击毙呢？于是责令他们在一周内活捉何次三和向天雷。该团八连连长王光汉带领“飞行组”从25日开始就追踪何次三。但由于何是个地头蛇，地形熟悉，又有人通风报信，因而屡次扑空。经过7个昼夜不停的跟踪追击，于4月1日在唠死坳山顶发现大向畹的山腰有炊烟上升。为防止敌人再逃进深山老林，他组织“飞行组”从大向畹的山顶多路向下包剿，当敌人发现开枪射击，他听出是快慢机，断定是匪首何次三无疑，当即摔出两枚手榴弹，“飞行组”扑上去，匪徒已向上下逃去。他们沿着被炸伤的敌人的血迹紧追于后，终于把何次三围在另一座高山上，接着正在搜山的二排和团部侦察排赶到，又围了个水泄不通。匪首何次山据险顽抗，王光汉指挥神枪手李克模将其击毙，两名卫士一名被打死，一名被活捉。“飞行组”在继续搜山中，于4月3日又配合搜山部队击毙何次三的参谋长何冠民。为在7天内活捉向天雷，二营长武福有

组织九连由连排干部各带一个班化装成土匪模样，在屯秋周围五华里的地域内，昼夜反复搜查，到3月31日，一排二班终于捉住了一名出来觅食的土匪于四。据这个匪徒供称：他们20日拂晓被我军打散后，他同另一名士兵随营长躲在小平山一个山洞里。营长用望远镜看到我们是穿便衣的，以为是自己人，便叫他出来联系，顺便弄点吃的。经过做于四的工作，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带我们去抓匪营长。小平山距屯秋两华里，匪营长所藏身的山洞，洞口很低，只能一个人爬进爬出，洞前被一块大石遮掩，周围长满了茅草，就是走到洞口也不易发现。于四以找到匪部为名，进洞诱出两名土匪，一个手提卡宾枪，一个握着左轮手枪。他们一出洞，埋伏在洞口的战士立即扑上去，端卡宾枪的匪徒还击两枪，当场被我击毙，匪营长夺路面逃，二班战士刘仕和从高崖上跳下把他摔了个狗吃屎，将他活捉。匪营长自称张仁和，操河南口音，说是驻马店人（向天雷是广西人），即送营部俘虏队看管。眼看活捉向天雷的期限到了，还不见向天雷的踪影，武营长和郭连长决定再次审问俘虏，当审到张仁和时，他嘻皮笑脸与干部、战士拉近乎（二营多系河南籍人），武营长觉得可疑，拿照片核对，并示意郭连长带战士将其左手掰开，见其左手小指是四节。向天雷见伪装不过，只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于4月2日束手就擒。截止4月5日左右，匪三一二师长冯常君和副师长曾远仁，二十一师师长潘彩荣，中、百、柳三县联防部参谋长奂秀华，七支队副司令覃继太等一批重要匪首亦被我活捉。至此，我师进剿四十八?土匪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主要匪首何次三被击毙与向天雷、潘荣斋被擒，就象搬掉了压在四十八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群众纷纷起来揭发地主恶霸与特务、惯匪相勾结残害乡里的罪行。为巩固扩大剿匪的胜利成果，使四十八寨人民永不再受土匪的欺凌，我们配合地方随军工作队，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斗争。依法杀了一批，关了一批，一些罪恶较轻的则交群众管制，对一般胁从分子当即予以释放，兑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一些隐迹于群众中的散匪主动向政府自首，依靠群众揭发又抓获了号称“小诸葛”的匪三一二师副师长兼融安县长的廖世祥等一些大小头目。通过清匪反霸斗争，初步树立了贫雇农优势，建立起乡村人民政权，成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使四十八寨人民开始当家作了主人。

我师在四十八寨剿匪，总计歼匪2500多人，其中团以上匪首56名。

为配合兄弟部队在九万大山的剿匪活动，4月10日将六四四团二营调至柳江以西，六四三团三营调至罗城与融安边界，担击九万大山之敌与发动群众。5月4日又将六四四团全部及六四三团一营调至柳城地区，完成发动群众和肃清土匪的任务。至9月间撤回。

半年剿匪的胜利，使我师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并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这主要由于我们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改编之初，我们就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使部队有了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特别重视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基本做到了战斗连队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依靠党委和支部的领导与广大党员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指战员，特别是一部分起义过来的官兵，同甘共苦，同生死共荣辱，从根本上保证了各级指挥员战斗决心的贯彻和政策纪律的执行。剿匪中被记功的指战员1047名，绝大部分是党、团员。其次是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与广大指挥员，后勤工作人员，都把提高部队政治素质作为完成剿匪任务的中心环节，抓紧各种机会利用土匪残害人民群众的事实对部队进行教育，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我军来自人民服务予人民的建军宗旨。起义过来的初

级指挥员和战士，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斗争中迅速提高，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许多同志自觉克服困难，在战斗中亦很勇敢，一些同志还立下了战功。再就是依靠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在进剿四十八寨土匪时，当地政府组织了9个随军工作队和500多民兵，适当进出寨区240多个村庄，控制地主分子，发动群众，配合了部队的进剿活动。还组织了大量的物资，基本保障了部队的供应。

恭城浴血记

罗 荣

1949年，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乘胜追歼蒋匪残部，向南挺进。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集结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在衡阳、宝庆地区摆下与我决战的架势。经我军反复搏杀、进击，取得了衡宝战役的胜利，白崇禧集团被迫由湖南率残部退入广西，妄图依托山区，组织防御阻我大军南进。同时，在我军还未入桂之前，白崇禧在桂林召集了伪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布置实施他的所谓“总体战”（在后来缴获敌材料中得知），计划组织几个伪军政区，潜伏保存残存实力，扩大和组织反动武装力量，以待事变，幻想配合蒋反攻大陆。

根据四野前委部署，我军取得衡宝战役胜利后，从1949年11月初旬开始，以十三、十四、十五和四十三军迅速占领信宜、茂名一，歼敌于粤桂边区；三十八军继续向百色挺进；三十九军直取柳州；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三军由湘桂边直击桂林、梧州；兵分三路进军广西。经过我军在湘桂边和粤桂边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势如破竹迅速歼广西之敌。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胜利完成了广西战役追歼残敌白崇禧部的光荣任务。

随着广西的解放，我军迅速接管城市，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军事管制，建立革命秩序。但是，白崇禧残部和各地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隐蔽于边远地区、山区、组织反革命力量，利用广西解放不久出现工作中的偏差和农民春荒的困难，欺骗、利用、威胁群众武装暴乱。

广西战役结束后，四十九军率三个师负责清剿和建设，一四七师负责桂北地区，一四六师负责柳州地区，我一四五师负责八步、平乐地区（即桂东地区）10个县（即：荔浦、蒙山、修仁、平乐、昭平、恭城、钟山、贺县、富川、信都、怀集等县），师部进驻八步，兼地委工作，师政委陈德兼地委书记、我当时是师的副师长，各团均负责三、四个县，成立中心县委。部队在进入指定县城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四三四团三营负责恭城县党政军事务，团政治处主任田维纺任县委书记。当时，该营兵力分散，师从该营抽调一个连到修仁县负责维护桂中南北铁路干线的运输治安，营又将一个连派到栗木（恭城县北的栗木矿）维护矿区的安全生产和协同开采锡矿；城内仅留八连，从八连中又抽一个排到莲花区去协助政府工作，同时还抽一个排协助工作组到区乡做筹粮工作。城内仅有八连三排和师侦察队之侦察员5人。

自我军进军广西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残部和当地股匪溃逃入边远的大小瑶山、十万大山。金秀瑶山这股残敌未遭全歼，还没有遭受我军有力打击，潜伏隐蔽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乘机组织反革命武装，发展反动势力，准备作乱。

1950年1月25日，以钟祖培（原国民党中将军长）为首纠集恭城匪自卫队副队长张旺林和栗

木圩大地主大恶霸张旺德匪众约 300 余人，煽惑裹胁群众 2000 余人，携带轻机三挺及少数枪械，其余均拿大刀梭标土炮，在恭城进行暴乱，将我驻各乡小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杀害。次日上午围攻县城。县城四周大小山头均为受欺骗的群众占领，呐喊助威。城南，河上的浮桥被匪拆坏，以断我交通。县城通往外地电话的线路被截断，情况十分危急。股匪一度攻入县城后，杀人、放火、抢劫商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恭城县城除八连三排外，还有县大队地方武装 120 余人。在县长、县委副书记和连副政治指导员领导下，面对这突如其来情况，连副政治指导员令一个班配轻机枪一挺，占领县府北面的山头，一个班局守县府大门，一个班固守司法大院，五名侦察员固守中山公园，固守待援。开始，当匪徒向县府冲来时，哨兵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停止前进。这是人民政府所在地，有事派人来接洽。”匪徒置之不理，继续向县政府走来。哨兵先礼后兵，朝天鸣枪警告，匪徒稍停后仍继续前进。排长命令：“准备战斗，把这批坏蛋放进来，各路同时开火给他来个大的杀伤，使他们知道解放军的厉害。”匪徒们执迷不悟，在机枪掩护下，仍向县府大院冲去，排长即下达命令：“打”！所有武器全部开火，以突然的火力向冲来的匪徒射击，伤匪数十人，匪见我有准备，即向街道两侧隐蔽起来。随后，匪徒又组织若干次冲击，仍遭三排连续打退，匪徒死伤惨重。三排依托县府大院围墙和小高地与匪徒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其时，匪数度攻击失败，急忙从莲花圩、西江、太平等地又拼凑 1000 余匪，于次(27)日拂晓又向我展开第二次总攻击。当时，占领城北山头的九班士气高昂，顽强阻击；匪集中较强的火力妄图突破山头，以陷县府，但均被九班击退。九班终因弹药耗尽暂时放弃阵地退回县府大院，与主力会合共同阻击。北山失守后，县府直接受到匪火力之威胁，使阵地孤立。在这紧急关头，县长，副书记和副政治指导员重新部署火力，誓将北山夺回。在七班火力掩护下，九班另配轻机一挺，以机智、迅速勇猛敢打敢拼的精神，一鼓作气，仅用 20 分钟夺回了北山山头阵地。三排战士沉着应战，连续不断地打退匪徒们数十次冲锋，适时反击，瞄不准不打，尽量节省子弹，以保存实力固守待援；他们一面战斗，一面不断的加修工事，由简到繁，构成了环形的防守阵地，以交通壕连结着县府大院运动更为方便，使阵地加强了稳定性，成为易守难攻的坚固阵地，并适时将自己的兵力和地方武装编成小组（3-4）人，两挺机枪，有重点的封锁两条通道。同时，他们轮流战斗，轮换休息，轮流吃饭。提出了“人在阵地在，有三排在就有县府大院在”的战斗口号，坚守阵地 5 昼夜，匪渐呈瓦解之势。

月底，我驻湖南部队和师的四三五团三营及团在攻打桂山岩洞的两连回戈恭城向匪施以南北夹击，各路增援部队进抵恭城附近时，以炮兵火力猛轰匪群，连队强行涉水渡河向匪徒围歼，匪徒一击即溃，向瑶山方向逃窜，受蒙蔽的群众四处逃散。恭城县城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我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手中。此战，我军毙匪 200 余人，伤匪数百人，缴获各种枪械 150 余支，俘匪数百人。三排由于在恭城守备战打得英勇顽强，大大的提高了我军的威信，受蒙蔽的群众真正认识到我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坚强不屈的部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获得了很大胜利，因而受到了四野首长的嘉奖，授予“英勇善战”的一面锦旗。

经我军四面包围、追歼，钟匪及其残部在我压力下无法活动，匪首钟祖培终究逃脱不出人民的法网，在人民政权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